

※ 夏志清院士紀念專輯 ※

「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報導

黃元意* 整理

前 言

胡曉真（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兼所長）：

當代最重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家夏志清院士於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逝世。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成就極為崇高，於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亦貢獻卓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表彰這位學術大師，彰顯他的學術傳承，於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假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邀請夏院士的友人、同事與學生共聚，緬懷夏院士的學術貢獻，以期對下一代學人有所啟發。

研討會請到中研院王汎森副院長蒞臨致詞，講述夏院士與中研院的因緣。之後的會議分為四個場次，議題分別是「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究」、「夏志清的文學觀」、「夏志清的小說史」以及「當代小說家論夏志清」。與會者包括與夏院士淵源深厚的李歐梵院士、王德威院士，臺灣的張淑香教授、陳芳明教授、梅家玲教授，以及年輕一輩的高嘉謙教授，來自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子善教授、北京大學的夏曉虹教授與陳平原教授、蘇州大學的季進教授，香港的陳國球教授，美國的孔海立教授和加拿大的雷勤風教授等學者。另外，有鑑於夏院士對現代小說之研究與發展的貢獻，特邀當代重要的小說家與會發表，以是，白先勇先生、朱天文女士、郭強生先生、駱以軍先生也現身會場，暢談他們所認識的夏志清院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夏夫人王洞女士亦特別由紐約來臺參加，她向聽眾敘說她與夏先生的生命故事，使學術殿堂中崇高的文學批評大師，現出其有血有肉、情感豐盈的人間形象。

* 黃元意，本所約聘研究助理。

研討會自始至終，精彩不斷，聽眾座無虛席，反應熱烈，正合了夏院士愛熱鬧的口味。會議當日，也安排《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新書發表會，引領臺灣讀者重新認識夏氏兄弟對當代文壇與學界的影響。有感於一代學術大師在傳世的著作以外，周遭人物的情誼與記憶也具有流傳的意義，《中國文哲研究通訊》整理「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上的學者發言稿，發表為「夏志清院士紀念專輯」。雖然篇幅所限，專輯未能完整呈現紀念研討會當天的討論與交流，但我們相信未能親身參與的讀者，仍可藉由文字，與我們一同紀念夏院士精彩絕倫的一生與成就。

王汎森副院長致詞：

本院人文組夏志清院士於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逝世，這是人文學界極大的損失。夏先生當選院士時年事已高，不便旅行，因此本院一直沒有機會邀請夏先生親臨發表他在文學批評領域的成就。即使如此，夏先生在本院人文組院士中具有很高的象徵意義，因為他是當代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他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成就極高，於古典小說研究領域亦貢獻卓著。我們今日閱讀他的著作，仍傾倒於他源源不絕的創見以及風格獨具的文風。夏先生過世後，學界已有不少紀念儀式，但夏先生雖是本院院士，臺灣學界至今卻尚未舉辦正式的紀念活動，向夏院士致敬。中研院文哲所與史語所為緬懷這位學術大師，彰顯他的學術傳承，舉辦「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邀請夏院士的友人、同事與學生共聚，討論夏院士的學術貢獻，以期對下一代學人有所啟發。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主辦單位邀請夏院士夫人王洞女士來臺與會，分享她所觀察的夏院士之為學過程與人生經驗。王洞女士曾代夏志清院士完成《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一書，負責其中三十二封信按語的編撰。她應該是當今最了解夏先生的人。

同時，經由王洞女士的整理，以及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的編輯，聯經出版公司剛剛出版《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第一集，將在今天下午正式發表。今年是夏濟安逝世五十週年，有特別的紀念意義。這些書信由夏氏兄弟珍藏多年，以夏氏兄弟的學術地位，他們的書信往來是現代文學、學術史的史料，也是中國現代史的史料，由這些書信看到一代學人的歷史環境、日常生活、心靈境界，其重要性非同凡響。

我個人跟夏先生不認識，只見過一次面，但是有四件事情值得在這裏一提。我從年紀很輕就讀過夏先生的文章，還有當時他在報紙上與人的筆戰。但是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我高中一年級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了夏濟安日記，我深

深被這一本日記的內容所吸引。尤其對夏濟安先生既想愛又不敢愛，注定一切要歸於失敗的愛情生活感到特別好奇，也特別著迷。所以我上次在紐約有機會和夏先生同桌時便問他：這裏面的女主角到底有誰啊？因為我知道裏面有很多人，到底都是些誰啊？這麼值得愛，可是又從一開始就是注定要挫折。我甚至有點懷疑夏先生是不是欣賞這樣的感覺，事實上就是在 enjoy 這種感覺。後來，我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馬逢華教授在《中國時報》副刊也寫過一篇夏濟安先生到美國以後的愛情，同樣的模式，同樣的結局。我覺得這裏面有一個世界，這世界雖然是個人的，但是也有永恆性，是人類的一種情境。

第二件事情：我大概是讀了夏先生《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的附錄，或是讀了胡適的甚麼文章而注意到小說家姜貴的《旋風》，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知道姜先生，因為他的書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到了。但是我以前在舊書攤買到一本《旋風》，接著還跟姜先生通過信，信是寄到一個寺廟，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臺中的寺廟¹，姜貴先生居然也回了一封信給我。奇妙的是，多年之後，我有一天收到姜貴先生的訃聞，大概是姜貴先生過世以後，有人在他的地址簿上看到我的地址，所以也通知我。這個因緣多少也是來自於夏先生。當時，我覺得姜貴小說《旋風》裏面講的是江青的故事。

第三件因緣是在二〇一〇年，我曾經代表中研院在紐約，於夏先生生日的場合授以院士證章。當時他的幾個大弟子都在場，我在那邊感受到弟子對他誠摯的感情，印象深刻。第四，雖然我只見過夏志清先生一次面，但我看過他很多的訪談，我覺得他很熱誠、很直率，他不停地講話和回答，很 charming！我喜歡這樣的個性。

夏志清先生和他的哥哥夏濟安先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們陶冶了許多的人，那個遺產將來會影響久遠。透過夏先生的家人、友人、學生的回憶，以及《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文字，今天與會者一定會有哲人未遠的感觸。我多年前受李有成先生的影響，買了一本 Leavis 的 *The Great Tradition*。其中 Leavis 在討論 George Eliot 時說：「藝術是有些條件的，他不可能置身於外而仍然是個藝術家。」我覺得夏先生基本上就實現了這句話。在這裏先祝大會成功。

¹ 在座有一位聽眾說是護國寺。

王洞女士致詞：

王副院長、胡所長、各位貴賓，大家好。非常感謝王副院長在百忙中來給我們致詞。王副院長提起，他曾來紐約參加過志清九十歲的生日宴會。當時志清特別高興，感激王副院長不僅出席他的生日宴，也代表中央研究院給他頒發院士當選證書及院徽。席間，王副院長又說，他上中學的時候看過《夏濟安日記》。剛才王副院長講到他跟濟安與志清的緣分有四點，其中一點就是他很喜歡姜貴的作品，姜貴是志清推崇的作家。看來王副院長當年是一位文學青年，對吧？（這句話是對著王副院長講的，王副院長點頭認可）

志清的遺願是出版他與兄長濟安的通信。從志清一九四七年年尾離開上海，到濟安一九六五年二月大去，他們的通信有六百多封。把這些信件輸入電腦、做註是一件很費時日的大工程。我很幸運能請到季進教授，領導蘇州大學的團隊幫忙做這個重要的工作。由王德威教授的精心策劃，在胡曉真所長和聯經出版社胡金倫總經理的大力推動下，《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趕在四月二十三日出版了。可以算是給今天紀念研討會的一個實質的紀念。

他們兄弟二人在信裏談時政、文學，也談京劇、電影，更多的時候談家事、女人，因為濟安先生終生未娶，父母要他結婚，弟弟鼓勵他交女友。所以這本《書信集》不僅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著作，也是一本有趣的書，應當暢銷。濟安是一個感情充沛的人，有很多幻想，不希望他的日記給別人看，可是志清的看法不同，他覺得濟安記下了當時的時事、物價，非常真實，且對愛情的專一執著也很難能可貴。志清不顧兄長的意願，在一九七五年出版了《夏濟安日記》。

他們兄弟倆的通信非常私密，按照濟安的意思，他是不要給別人看的，可是志清要發表，我當然義不容辭地代他做這件事情。我身為主編，得寫一篇短文介紹《書信集》，作為「前言」。讀者看小說的時候總是希望對號入座，在我這篇「前言」裏我寫道，在夏先生九十歲的時候，有一位貴賓深受《夏濟安日記》的感動，請大家猜猜，這位貴賓是誰？（沒有點破，自然是王副院長）

我非常高興，今天看到這麼多志清的好朋友、同事、學生來參加這個紀念研討會，肯定他在中國文學上的貢獻。志清很有眼力，他把張愛玲推上了文學的殿堂，使錢鍾書、沈從文的作品重新受到重視。他快退休的時候，物色接班人。當年他不認識王德威教授，只看了王教授的著作，聽了王教授的演講，決定請王教授來哥倫比亞大學繼承他的位置。沒有想到，王教授除了學問好，口才好之外，還非常能

幹，很會開會！為他開了很多次會，像夏志清的退休會議、夏氏兄弟學術研討會、九十歲生日會等，在座的朋友們有些曾參加過這些盛會。王教授給志清晚年帶來很大的快樂，因為志清是一個很喜歡熱鬧的人，而且他一天到晚覺得自己「偉大」、「不朽」。這麼多人來慶祝為他舉辦的盛會，他高興得不得了。所以夏志清能活到九十幾歲，而且很快樂，王教授的功勞很大！

志清說話瘋瘋癲癲，但做學問一絲不苟。一九七〇年代他跟高克毅先生著手合編一本元曲選。高先生當年主持《譯叢》(Renditions)，有些翻譯元曲的稿子。志清在哥大教授元曲課，有學生翻譯元曲的作業。他們集結了這些譯稿，先由高先生審閱。高先生雖然中英文造詣都很高，但為人十分謙虛，覺得志清的學生都是博士生，不便大改。志清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處理，結果就把這些稿件壓在那裏，沒有校訂。王德威教授覺得三十年來，還沒有一本翻譯元曲的好書，他非常聰明，而且很會找機會，看見李惠儀教授剛剛出了一本書叫《左傳》，正好有個空檔，就請李惠儀教授來完成這本《元曲選》。李惠儀教授中英文都很好，年輕，做事又快，不到半年就寫好了導言，改正了譯文，還翻譯了一齣元曲。可是在美國出書很麻煩，要給專家審閱，所以沒有趕在志清生前出版。《元曲選》是二〇一四年三月才出版的，算是志清最後的一本書，李惠儀教授是二〇一四年的新科院士，我特別帶了這本書送給王副院長，表示我對王副院長的崇敬與感謝。

胡所長，非常感謝您為志清籌辦這個紀念研討會，王教授，也感謝您多年來為志清所做的一切，再次謝謝各位親朋好友，來參加這個盛會，祝大家好！謝謝。

一、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研究

彭小妍（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夏志清先生一九六一年的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國際學界的基礎，從此這個領域在國際間成為顯學。此書除了使向來被視為通俗作家的張愛玲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代表人物，更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感時憂國」的論述；書中標舉的寫實傳統，也主導了後來數十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後來的學子均不斷演繹他的理論，企圖與他的理論對話，包括夏先生學生輩的學者，例如今天在場的李歐梵老師、王德威老師、白先勇老師，以及梅家玲老師和我——我們兩人算是孫字輩的學生了。

所謂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在夏老師的引領下，學生們都努力嘗試要另闢蹊徑，例如李歐梵老師一九七三年的著作《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王德威老師二〇一一年的著作《現代抒情傳統四論》，都是夏老師學術傳統的開枝散葉。我們今天紀念夏志清先生，也是彰顯他的學術傳統源遠流長。

白先勇（臺灣大學講座教授）：

王副院長、夏師母、各位學者同仁們好。今天講夏志清先生和夏濟安先生，他們學問那麼大，時間又那麼短，我想講一些他們兩個人的文學觀及他們的指導對我們的影響，還有對我個人的影響。

夏濟安先生走了之後，聽說是夏志清先生親自去收拾他的遺物。他留下了很多書。他們倆兄弟的感情不用說了，已經被寫了很多很多。因為我們都是夏濟安先生的末代弟子，夏志清先生覺得好像應該送一些夏濟安先生的遺物讓我們作紀念，他送給我的是一本書，Martin Turnell 的 *The Novel in France*。Martin Turnell 是英國 New Criticism 的健將，這本書很有象徵性，夏先生專門送給我。今天我想從他們兩個以新批評的方法，如何介紹中國文學領域講起。當然，他們的學問遠超過新批評。但不管他們倆是否在寫文學史，他們基本的 methodology 是用 New Criticism。看完這本書後，也回想起來，的確，我們《現代文學》這一代——我旁邊這一位李歐梵、王文興、歐陽子——文學涵養多多少少都受了這兩位夏先生的影響。

最重要的還是新批評的方法。我想現在很少人記得這一本雜誌：《學生英語文摘》，趙麗蓮教授編的，每一期都有夏濟安先生的一欄。我中學的時候就開始念這本雜誌，而且每一期就先念夏先生的那一段。我頂記得有一次夏濟安先生批評 Hemingway 的 *A Farewell to Arms*。他就分析書開始前面那一段，海明威說一條河床乾了，石頭像白骨一樣，white bone，象徵以後的死亡。我記得夏濟安先生對每一個字講究它的來源，這種方法對我們日後有很大的影響。

後來，夏濟安先生給我最大的影響是《文學雜誌》。我想《文學雜誌》事實上是替臺灣的文學研究和文風定了一個調。夏濟安先生的文學觀、文學主張在這個雜誌裏充分地表現出來，而對整個臺灣文壇都有影響，我們《現代文學》也是繼承了《文學雜誌》的整個脈絡。而我們後來多多少少都受這整個方法的影響，我舉一篇文章來說：夏濟安寫的〈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我是第一次面對一篇

論文「如何看小說」，夏濟安先生不光是評這個小說，還說怎麼寫小說，我想可能因為他是一個 editor。後來我投稿後，他也告訴我這一句應該這樣寫、那一句應該那樣寫。追根究底還是 New Criticism 那種對待文學的方式。那一篇論文，我記得他寫女主角是唱京戲的，寫了一個看京戲的場景，他感覺寫得還不夠，他說應該場景調子拔得多高、用甚麼方式寫。我看了，在我寫〈遊園驚夢〉的時候，我也寫了唱戲的場景，好像夏先生那個提示要寫得非常戲劇性的時候，一個調子要拔得多高。我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大概不覺得，但夏濟安先生的那種指示，我想對我是有影響的。我在寫〈遊園驚夢〉的時候，寫來寫去，都達不到夏濟安先生講的那一種調子。我寫第五遍的時候，換個方式用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來寫，打通了時空。我想夏濟安先生自己可能不知道，他的方法一直被延用下來，影響了很多人，尤其對我個人的影響。我想同輩的作家，像是王文興、歐陽子，他們不管是教書也好、寫論文也好，看來我們都是夏氏弟子。我想那種方法對我們求學那時代，產生很大影響。

我雖然沒有被夏志清先生教過書，但是他的文章經常在《文學雜誌》上出現。他那一篇評張愛玲《秧歌》的文章，對我們的 impact 非常非常的大。我想夏志清先生對臺灣文學也有不少貢獻。夏志清先生雖然沒有來臺灣，但是他遙控，從紐約、從美國東岸發聲，穿過太平洋，對我們臺灣影響也很大。他的那一本《現代小說史》我們講過太多太多，我就不說了。他的另外一本書《中國古典小說》也有很大的、默默的、很深沉的影響力。那一本書還沒有成書的時候，他已經寫了幾篇關於中國古典小說的文章，譬如〈《紅樓夢》裏的情與憐憫〉，可說是那本書的前奏，我們也都發表過了。後來那本書成稿的時候，我知道他寫這本書，而且我們《現代文學》非常需要他的稿子。他還在校稿的時候，我請夏先生快點把校稿寄給我！我記得他就寄了一疊厚厚的校稿。我大概花了一個星期，晝夜不眠看完。那些經典小說我都看過，《三國》、《西遊》、《水滸》這些都是相當熟的。看了夏志清先生的評論後，噢！好像一扇一扇的窗戶都打開了，以前我都沒看到的，我就興奮得不得了。在我個人的閱讀裏，很少看論文看得這麼起勁的。論文看一看就想睡覺，難得看得特別起勁。所以我們一篇篇的發表，翻成了中文。我想，這對我們中文古典小說研究，及臺灣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們有很大很大的衝擊。

兩位夏先生的文學研究遺留下來的，源遠流長，影響了一代一代。雖然後來新批評已經不流行了，但那個基礎在那裏，教我們怎麼看小說。我個人非常感謝兩位

老師對我們文學上的教導和指導。我到今天還非常懷念他們。

李歐梵（中研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這本《書信集》的第一卷，我有幸先睹為快，因為季進在整理手寫的書信原件過程中，對於其中的大量好萊塢電影片名和明星的英文原名，有時辨識不出來，求救於我，我說：別的方面我沒有資格幫忙，但電影方面我絕對是個大影迷，而且和志清師見面時，常常「較量」電影知識，雖然每次都是我敗下陣來，但至少我掙得了一個電影同好的榮譽。

現在這本《書信集》出版了，我仔細從頭讀到尾，覺得需要面對一個不大不小的詮釋問題：為什麼兩兄弟的信中談這麼多電影？幾乎和他們討論的文學問題相等？何況是在這一個動盪不安的大時代裏？後世的「感時憂國」論者或愛國人士又會作何感想？說不定會指責夏氏兄弟紙醉金迷，逃避現實？我個人的感覺恰恰相反，反而覺得這批私人書信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難能可貴的歷史資料，至少讓我感受到一個留學生（夏志清）和一個流浪漢（夏濟安）的日常生活，雖然時空相隔，當年志清師在耶魯的觀影經驗與我感感相通。何況他們看過的影片我大多也看過（年輕時代在臺灣看，或多年後經由影碟重看）。如果把他們的觀影經驗和閱讀西方文學理論的經驗並置的話（信中本來就是如此），意義又何在？

眾所皆知，夏氏兄弟接觸的西方文學理論是「新批評」（New Criticism），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顯學和主流。

夏氏兄弟得名師燕卜遜 (William Empson) 嫡傳，燕氏當年在華講學多年，造就了不少人才。夏志清的一篇論文就是得到燕卜遜的欣賞和推薦，才得到「李氏獎學金」到美留學的。他抵達美國後，又蒙「新批評」學派領袖藍遜 (John Crowe Ransom) 推薦給耶魯的幾位新批評大師受教。我們從他初到美國寫給夏濟安的一封信（1947年12月12日）中，得知當年「新批評」的大本營是在中西部的 Kenyon College，藍遜在此舉辦暑期班，「廣羅批評人才，Empson, Brooks, Winters, Tate, Harry Levin, Trilling」陣容盛極一時²，他到了耶魯的信中又提到原來 Brooks, Tate, R. P. Warren 都是 Ransom 的學生。耶魯的名教授還有比較文學的 René Wellek 和教導

² 王洞主編，季進編著：《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一（1947-195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年），頁48。

十八、九世紀英國文學的 Frederick Pottle，後者後來成了他的指導老師。這一個系譜可謂是「真傳盛名」(distinguished)，讓我們肅然起敬。

「新批評」的特色是注重文本——特別是詩——本身的藝術結構和價值，特重語言和形式，作者的背景和歷史環境反而不受關注，所以頗具精英主義的色彩。夏志清在耶魯學習的過程中領悟到：對於小說的批評，只能從詩評的技巧引申出來，進而發揮。然而小說畢竟不可能全部作「精英」方式處理，較通俗的小說怎麼辦？這反而是乃兄夏濟安在通信中屢屢提起的問題，甚至在香港時還想翻譯幾部像《亂世佳人》和《基督山恩仇記》之類的「皇皇鉅著」出版賺錢，向志清打聽美國的暢銷書近況³。夏志清在回信中提到幾部作品，似乎不自覺地把這些作品和電影改編連成一氣：例如福斯的 *The Prince of Foxes*（《狐狸王子》），米高梅 (MGM) 的 *Quo Vadis*（《暴君焚城錄》）和 *Ivanhoe*（《劫後英雄傳》），然後又提到一大堆小說的名字，越說越多，如 Huxley 的 *Ape & Essence*，Dreiser 的 *An American Tragedy* 和 *Sister Carrie*，James Cain 的 *Double Indemnity* 和 Raymond Chandler 的偵探小說等，最後提到 Tennessee Williams 的 *The Streetcar Named Desire* 和耶魯的老師 Robert Penn Warren 的得獎小說 *All the King's Men*⁴。這一個書單絕對不屬於「暢銷小說」，而是夏先生認為值得看的小說，精英和通俗已經混成一談。小說的評價單用新批評恐怕不足，所以夏先生後來才會提到 F. R. Leavis 的道德評價。學界對此早有共識。那麼電影呢？好萊塢的片子怎能和文學名著相提並論？然而在夏氏兄弟的書信中偏偏就是如此，他們並不把看電影完全視為消閒。信中往往第一段講文學，第二段就談電影，讓我們覺得在夏氏兄弟的生活中，文學和電影的地位是對等的，而且恰好互補，嚴肅的「新批評」做不到或得不到的，說不定會在好的影片中得到了。換言之，電影是求學和生活之間的一個中介，就像暢銷小說一樣。

夏氏兄弟的看電影習慣，大概是在上海養成的，和張愛玲一樣。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電影院並不比美國遜色，好萊塢的影片幾乎壟斷市場，看西片變成了上海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生活習慣。夏氏兄弟把這個習慣帶進他們在海外的心理歷程之中。他們對好萊塢女明星的品味不盡相同，濟安喜歡純情少女型的如 Joan Leslie 和 Jean Simmons，而志清喜歡外表秀麗的新星如 Dorothy Malone，信中兩人品頭論

³ 同前註，頁 344。

⁴ 同前註，頁 349-352。

足，甚至還帶朋友寫信到電影公司去要明星照片。這個風氣已經失傳了。

當時的好萊塢各大公司也往往從暢銷小說和文學名著取材改編，蔚然成風，越接近「類型」(genre)的文學作品越容易被搬上銀幕。這個傳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才逐漸式微，電影逐漸演變成以特技取悅觀眾、市場至上的純消費產品。

夏氏兄弟對於電影的品味，和文學一樣，評論起來也是一絲不苟。他們的電影知識豐富，雖然當時還沒有電影的「作家論」，但他們挑選出來的導演和作品，幾乎全是經典，被後世電影學者所公認，有的我也看了不少遍。例如夏志清認為手法最細膩的 William Wyler⁵，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導演的 Henry James 的名著 *The Heiress*，夏濟安在香港看到了，認為是他「到香港後所看到的最好電影」，甚至引起他對於 Henry James 的愛好⁶。從電影到文學，中間並沒有太大的分歧。夏志清在回信中說：高爾溫 (Samuel Goldwyn) 公司的好片子如《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黃金時代》(*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等全是 Wyler 導演的⁷。我在此要忍不住加一句：還有奧德麗赫本主演的《羅馬假期》(*Roman Holiday*)，也是 Wyler 的傑作。夏志清還提到 John Huston 和 Billy Wilder⁸，都是後來公認的名匠。誠然，他們兄弟看過的影片中也不乏劣作，如 Esther Williams 主演的游泳歌舞片《洛水神仙》(*Neptune's Daughter*)，夏志清連她隸屬的米高梅公司歌舞片製片家也一清二楚：Joe Pasternak，說他旗下沒有名角；而另一位 Arthur Freed 旗下則有好演員，如 Gene Kelly。夏濟安更喜歡黑白片，特重攝影，如 John Ford 的 *How Green Was My Valley* 及 *My Dear Clementine*（後者是西部片的經典，原名應是 *My Darling Clementine*），難得的是季進和他的團隊把這些影片資料全部加上註解，功力匪淺。我們如果把夏氏兄弟看過的佳片列一個名單，恐怕也和後世電影學者公認的名單差不多。

第一卷的書信中沒有提到夏志清最喜歡的電影導演，我可以肯定是劉別謙 (Ernst Lubitsch)。這位從歐洲流亡到好萊塢的導演，以喜劇片和歌舞片享譽影壇，幾乎在每一部片中都展露了「劉別謙風格」(Lubitsch touch)——雋永，機智，小動作的場景處理，妙不可言。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把劉別謙風格和夏公本人的妙語如

⁵ 同前註，頁 429。

⁶ 同前註，頁 425。

⁷ 同前註，頁 429-430。

⁸ 同前註，頁 430。

珠作風相比，後來承蒙夏師母證實：夏公的確喜愛劉別謙。這個小例子再次證明，在夏公的日常生活中，電影和文學不分家。據夏師母說，在他退休的日子裏，常常在家看電影。可惜我早先不知道，否則一定會寄上我珍藏的劉別謙影碟。文學大師在業餘喜歡看電影的大有人在。據說哈佛的比較文學教授（也是 Levin 的接班人）Claudio Guillén 退休返回西班牙定居，去世之時正在看一部好萊塢電影。這個傳說如果屬實，我猜他看的一定是一部喜劇片。好萊塢喜劇片的文藝風格，在四五十年代到達高峰，另一個傳統風格是「黑色電影」(Film Noir)，顯然夏氏兄弟對這兩種風格都不陌生。第一卷書信中，兄弟二人看的歌舞片甚多，好壞參差不齊，因為這正是好萊塢第一大公司米高梅當道的時期，他和另一家大公司派拉蒙（手下一度擁有數百家電影院），幾乎把持了每年的最賣座影片。夏志清在心中也不忘一一列舉，譬如在一九四九年正月七日的信中，就從 *Variety* 雜誌抄錄去年十大名片的片名，並作評論說：「MGM 出品甚多，營業最盛……不過 net income 還是派拉蒙最多，因為 Par 戲院多，收入遠超出各公司……不知何故 MGM 的 net income 如此的少也。十大明星：Crosby, Grable, Abbott-Costello, Cooper, B. Hope, Bogart, Gable, Grant, Bergman。」⁹ 這一段敘述，看似影迷「八卦」，為什麼列得如此詳細？我以自己的經驗猜測，可能夏公也看了不少影迷雜誌，特別是 *Variety* 和 *Screen Play*（前者是影壇行家看的）。這些雜誌皆是各大公司的宣傳品，內容以明星照片和生活報導為主。如今連這個傳統也式微了。

我從高中時代就沉迷於好萊塢電影，每週至少看三四部，甚至逃課偷看，幾乎被校方抓到，也曾把這段往事為文記之。這個觀影習慣，我也一直帶到美國，不論課業如何繁忙，心情如何沮喪，經濟如何拮据，但每週末看電影必不可少，甚至為了看電影而廢寢忘食。如今讀到夏氏兄弟的通信，能不動容？！俱往矣！作為夏氏兄弟的「不入門」弟子，我只能寫這篇「旁門左道」的文章來表示我的崇敬與懷念。

王德威（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我們的夏先生喜歡熱鬧，如果今天在座的話，應該是坐在季進的位置，然後手舞足蹈地點評臺上報告的夏先生生平事蹟和學術成就的各項優點與缺點。

⁹ 同前註，頁 245-246。

夏先生是一位充滿生命活力的學者。我一九八〇年第一次見到他，記得他當時在威斯康辛大學做一場關於《玉梨魂》的演講，我到今天都沒有弄清楚他講的內容。他是用一種非常急而且快速的蘇州腔英文，講述這個哀艷感人的民初鴛鴦蝴蝶派小說。說到動情的時候，他站起來，走到觀眾席上，做出各種奇怪的舉動。對我來講，當時剛從臺大到美國留學，我的老師包括顏元叔教授等，也知道顏老師和夏先生的論戰，心目中對夏先生敬畏有加，沒想到他是如此的風趣。

一九八六年，我有一個機會在德國開會，李歐梵也出席。那是我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所以我願意在這裏稍微說明一下。我記得會議是在德國南部的一個小城市。在那次會議裏，正好排在與我同時發表論文的另外一場就是李歐梵教授。我記得那一次大概有四五十位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出席。在我們論文同時發表的那個場合裏，絕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五——同事都到了李歐梵的場次。我的那個場次，包括我自己和主席在內有七位。記得在座的幾位聽眾包括李昂——臺灣的作家，另外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夏志清先生。所以那一次是讓我特別感動的經驗。我記得那一次我報告的題目是老舍和臺灣的王禎和。沒有想到在一九九〇年，他督促我去申請哥倫比亞大學。這是我和夏先生結緣的開始。

在哥倫比亞的十五年裏面有太多太多令人回憶、令人難忘的經驗。當然，夏師母是永遠在場的。想到和夏先生這段緣分，我真的有很多感觸。梅家玲所說的劉備與曹操的典故中，我想劉備當然是夏先生，我是那個糟糕的諸葛亮，但曹操可能是李歐梵，因為他一再地說服我跳槽。

我今天在這裏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述說我個人對夏先生這些年的學問，還有他為人的感觸。我舉三點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關於方法學的問題。我想剛才國球、歐梵、家玲教授都提過了。中國文學新批評的傳統是可以上溯到一九二九年 I. A. Richards 到清華大學任教的時候，他所引起的風潮。到一九三〇年代，不論是朱光潛或是錢鍾書，直接或間接地都受到當時新批評最早的風潮影響。夏氏兄弟在一九四〇年代，已經在中國國內受到新批評大師的影響。當然，最重要的媒介是燕卜遜。所以當夏志清先生到美國讀書的時候，可以說是有備而來，因此他可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讓這些美國名牌教授印象深刻。我想這跟他個人學術淵源是有關係的。

到了六〇年代，夏先生對於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典範，我想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事實。但在今天這個場合，我願意特別提出來。一九六一至一九

六三年，夏先生和歐洲的漢學大師普實克教授有非常重要的論戰，在座的李歐梵教授有這樣的榮幸，曾經受業於普實克與夏濟安門下。我覺得在任何批評論述裏，如果只有單音獨鳴的話，不足以成就一門學科的典範意義。所以除了夏先生代表的歐美新批評下的傳統，以及英國 F. R. Leavis 的人文主義傳統，他和普實克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各自就自己心目中最精準的、最科學化的研究批評方法所做的辯論，可說是歐美的漢學界——尤其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領域——一個最重要的時刻。我期望我們在未來，對於中國或是華語語系的研究，能夠仍舊有這樣大的辯論的聲音產生，而且是言之有物的聲音，用不同的批評立場，更讓廣義的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繼續發揚光大。我想夏先生如果在這裏，應該也會同意我們這樣的觀點和期許。

第二點則是講到立場和態度的問題。我想我們都知道夏先生堅強的反共立場。在過去這六十年裏面，也因為這樣的立場，夏先生受到很多批判。尤其是六七〇年代，美國學界左傾風潮風起雲湧的時候，夏先生的立場無疑不受歡迎。但我要強調個人對於政治或學術的立場是一回事，真正從事學術研究和判斷的這種態度，未必與立場相輔相成。我們今天回顧夏先生對於研究過程裏，不只是對夏先生發掘張愛玲，或重新發掘錢鍾書，以及沈從文的貢獻，給予最高的評價。我們同時對於他怎麼樣重新看待魯迅，以及魯迅以降比較次一級的左翼作家，所抱持的批判態度，還有悲憫的情懷。我想只有這樣大的包容力，才更讓他的學術風範和批評方法有更複雜和細膩的表述。

陳國球教授提出，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之間，夏先生引領的「感時憂國」論述，帶來學術的新典範。用今天字面的觀點來看「感時憂國」，往往望文生義，以為是對於五四以來中國文人家國情懷的致意。事實上，誠如國球所說，夏先生對於「感時憂國」這樣一個立場是有批判的。他提到一代或兩代中國作家及知識分子，因為過分對中國情有獨鍾，以至於愛極生恨，他們事實上採取了非常偏頗的批判立場，來看待自己的國家，以及國家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聯。他們對中國如此愛恨交加，產生各種執念，以致讓他們不能夠把眼光放大，去擁抱廣義的世界文學。

今天基於我們在臺灣談夏志清先生和夏濟安的研討會立場，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這樣一種「感時憂國」的精神，或是對這種精神的反思，也適用於我們今天看待臺灣的文學與人文環境呢？當我們刻意的去強化某一個族群、某一種政治立場、某一個國家立場的優和劣的時候，這樣的立場是不是會影響作為文學研究者，以及人

文研究者一個更廣闊的對生命擁抱，以及對世界文學的關懷呢？所以我認為夏志清先生感時憂國的批判，不只適用於廣義的中國文學，對於此時此地從事當代中國文學，以及當代臺灣文學的我們，仍然是意味深長。

最後一點，談到夏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立場，衍生出來的對於文學及生命交織的態度。這當然是和最近夏氏兄弟的《書信集》出版有密切的關連。從一九四七年以來，將近二十年之間夏氏兄弟的通信中，我們可以理解這對兄弟對文學的關懷是如此的深切。所以他們對文學討論，或是任何文學的事件，已經融入到他們日常生活裏面，也就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相對於此，他們對於生命上的各種看法，不論是穿衣吃飯、看電影、郊遊或是追女朋友，也必須對應某一種文學的高度，就是感性、感悟的高度，來給予重新的評價。我覺得這一點與我們流行的，以強烈的、嚴密的學科制度作為研究文學的方法，有很大的區別。他們一方面用文學的方式來看待生命、來包容、來批判生命；一方面把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也一本正經的好好看待討論。他們幾乎像是用研讀文學小說的姿態看待女朋友、評論電影、戲劇。夏氏昆仲這種相互辯證的治學、問事方式，我覺得讓我們這一輩的學者、學生非常著迷，也代表另外一種文學或是做人的典範。

所以我覺得夏氏兄弟是我們的資產，應該有一個臺灣的定位。在今天這樣的立場，不只是緬懷夏志清先生和夏濟安先生過去的貢獻，也應該給我們這一代，尤其是在學的學生，有更多啟發的契機。

梅家玲（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今天來此參加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以及《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新書發表會，心中不無感傷。回想十年前，也就是二〇〇五年，我曾受王德威教授之邀，與在座的陳平原、陳國球教授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與會發表論文的，還有韓南教授、李渝教授等人。夏志清先生全程參與，精神奕奕，妙語如珠，會議總結時，雖然說要感謝主辦人王德威教授，卻還不忘說笑調侃，他指著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說：「我三顧茅廬，好不容易把王德威請來哥大，沒想到他後來卻投奔敵營，跑到曹操那裏去了。」

一晃眼，十年過去了，夏先生、韓南教授、李渝教授相繼辭世，但當時的許多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由於當時我發表的論文是談夏濟安、臺灣大學與《文學雜誌》；會後，我將論文修訂，發表於《臺灣文學研究集刊》，並將抽印本寄呈夏先

生指教。夏先生親筆回信，多所嘉勉，迄今感懷在心。因此，接下來我將延伸當年談夏濟安與《文學雜誌》的觀點，簡單談談「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特別是關於新舊小說方面的論點，以及他對於「書信」的看法。

《文學雜誌》由夏濟安先生於一九五六年創刊，他曾表示，該刊的重要目的之一，乃是「期待真正有現代眼光，能融合中西，評論中國舊文學的人」。這一理念，顯然充分得到弟弟志清的支持。檢視夏氏兄弟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夏志清先生發表的，計有〈張愛玲的短篇小說〉、〈愛情·社會·小說〉、〈評秧歌〉、〈文學·思想·智慧〉四篇，除了大家所熟知對張愛玲的評論之外，其中〈愛情·社會·小說〉一文，即是有關古典小說的討論。夏濟安發表的文章包括了〈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白話文與新詩〉、〈舊文化與新小說〉、〈論自然主義小說之沒落〉、〈一則故事，兩種寫法〉等多篇，大都兼論新舊文學。其中〈舊文化與新小說〉，不但試圖融匯新舊文化與中西文學，也是對〈愛情·社會·小說〉的回應，兄弟二人可說都以實際的論述，共同落實了以現代眼光融合中西，評論中國舊文學的理念。夏濟安逝世之後，《現代文學》與《幼獅月刊》都曾聚焦於「古典小說研究」，製作紀念專輯。夏氏兄弟之間，也經常藉由書信往還，彼此相互討論。因此，爾後夏志清將自己有關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論文結集成書時，便特別在序文中表示：「《中國古典小說》是奉獻給先兄夏濟安教授的。」

夏氏兄弟對於研究「舊文學」的貢獻，由此可見。不止於此，這篇序文同時提到：

〔我〕總想及早把一九四七～一九六五年間我們兄弟魚雁來往的整套書信刊印出來，留給世人一個最真實可信的人生與時代的紀錄。

而這裏，就又涉及到了夏志清先生對於「書信」的觀念。早在先前與顏元叔先生打筆仗時，夏志清就曾在〈勸學篇〉一文中說：

埃爾門 (Richard Ellmann) 和伊德爾 (Leon Edel) 都可以說是以「新批評」起家的名教授。後來埃爾門專研喬埃斯，伊德爾專研亨利·詹姆斯，都寫了厚厚的傳記，伊德爾的更長，分冊發表。之後，二人都匯集了他們心愛作家的書信。最近埃爾門新出一種喬埃斯書信選集，把最猥褻的情書也發表了。文學家傳記的主要目標當然不是批評，但在文學傳記家和文學理論家各走極端的今日，我毋寧欣賞傳記家。他們實事求是，留給後人一大批寶貴的資料，比起各人自造空中樓閣，自編一套術語的理論家起來，貢獻要大得多。

夏志清在學術上師承歐美「新批評」諸子，卻一向對於傳記史料，尤其是書信，極其重視。他以當代新批評大師埃爾門和伊德爾為例，說明書信之於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並據此強調傳記家實事求是的貢獻。而他自己，當然也身體力行，蒐羅、保存重要作家的書信不遺餘力。這一點，在幾年前的一則軼聞中得到旁證：二〇〇九年，夏志清因病入院，治療過程中深感沒有尊嚴，了無生趣，於是吵著要「交待後事」——而所謂「後事」是什麼呢？據夏師母說：不是錢財，不是房產，而是：「濟安哥哥的信札放在哪？張愛玲給他寫的信藏在哪？喬治高的又是收在哪！」也因此，今天《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的出版，當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之所以問世，夏師母絕對功不可沒。這讓我再度回想到十年前，「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夏志清先生總結之後，夏師母也致詞感謝王德威教授及與會學者，當時她曾提到：夏先生喜歡熱鬧，但朋友們帶著禮物來家裏看他，他卻從來都不記得誰送了他什麼。這時，臺下的夏先生冷不防冒出一句話：「我太太記得！」當時引來了哄堂的笑聲。但我想，夏師母記得的，豈只是誰帶了什麼禮物來看夏先生？夏先生重視書信，夏師母總是記得。她先是為他整理出版了《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之後又在季進教授協助下，出版《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夏師母貫徹了夏志清先生的理念，以這批書信，「留給世人一個最真實可信的人生與時代的紀錄」，也讓我們記得夏氏兄弟，記得他們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記得他們曾經走過的那一個時代，與真實可信的人生。在此，我願向夏氏兄弟與夏師母致以最高的敬意。

季進（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從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六五年初，夏志清與長兄夏濟安先生之間魚雁往返，說家常、談感情、論文學、品電影、議時政，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留下了六百多封書信。夏先生晚年的一大願望，就是整理發表這些通信，可惜生前只整理發表過其中兩封。夏先生逝世後，夏師母王洞女士承擔起了夏氏兄弟書信整理出版的重任。六百多封書信的整理，絕對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因此王德威教授命我協助夏師母共襄盛舉。我特別感謝夏師母和王德威的信任，讓我有機會加入書信整理的工作，通過書信走進夏氏兄弟的心靈世界，重新認識兩位夏先生。在整理的過程中，我們仿佛每天都與夏氏兄弟同呼吸，共悲歡，感慨萬千，難以言表。

閱讀書信我們會發現，雖然夏氏兄弟生活於時代大變之際，但是書信中對時

局的動盪，卻罕見地著墨極少。除了一九四九年前後，夏濟安對時局的關切，幾乎看不到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呈現。到了後期，夏濟安才開始較多地涉及社會政治的評論。這很能看出夏氏兄弟的志趣是一如既往的，對政治的、革命的動盪向來缺少興趣，但對生活本身始終卻充滿了熱情。他們隨時隨地、樂此不疲地談論著關於京劇、文學、電影、女友、穿衣、吃飯等話題，坦誠地交換彼此的看法。無論生活如何困頓，兄弟兩都認真地生活，對生活充滿了熱愛，文學、電影、女友、家庭等等，本身就是生活的重要內容。這讓我們有機會看到這一代讀書人最真實的生活常態，最感人的人性情懷。現在重讀這些書信，會發現這些無意中保留下來的日常生活寫真，其實也最能代表那個時代生活的質地，是真正的生活本質，也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文化。當然，其中也有日常生活的政治。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瑣碎，看到大時代的印記，看到時代對個人命運的掌控。可以說，《書信集》與現在流行的重返日常生活的文化研究，倒有一種對話的可能性。現在回過頭來，夏氏兄弟這種不迎時而上的心態，可能正是無數普通知識人的無奈選擇。普通的知識分子或讀書人，面對時代的大變，他們無能為力，只能被動地接受時代的安排。他們對時局大勢未必不感興趣，但卻不會成為他們討論的中心話題。夏氏兄弟本質上只是一介書生，即使在物質條件相當艱苦的環境，對精神層面的追求從來沒有放鬆，不斷地交流關於文學、電影的看法。這種交流可能正是夏氏兄弟尋求自我價值認同的必然選擇，時勢如此變幻不定，唯有在這些話題中，他們才能找到永恆的寄託。

這種對大時代的「避重就輕」，與其說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態度。這種無奈中，當然有讀書人的「純粹」，還有個人心理的、情感的、生活的等各種因素的制約。夏氏兄弟當年都只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生活和學習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未來也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他們對家國的憂患，不得不讓位於生存的壓力。相比而言，夏濟安可能比夏志清更有濟世之才，夏志清則一心向學，不作他想。從小家庭的薰陶和教育，還有西方人文主義的訓練，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投筆從戎，真正投身到改造時代的潮流之中。他們更相信文學的力量、人文的力量，而不是革命的暴力。所以，他們更願意遠離大潮，做一個邊緣人、普通人，這是他們的性格所決定。我想，這也是當年絕大多數讀書人無奈的選擇。當年很多知識分子確實是縮小甚至放棄了個人的悲歡，應時擴大了國家憂患，投身到拯救國家社會的大業之中，這是應該高度褒揚的，但對於更多像夏氏兄弟這樣的讀書人的無奈選擇，我們也應該予以尊重。畢竟，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精神的賡續、文化的傳

承，可能更需要像夏氏兄弟這些普通知識分子的「純粹」。

一九四九年以後，兄弟二人都不得不開始了漂泊、離散的生活。對於夏志清來說，他一九四七年底即已赴美留學，一九四九年時局大變時，他還在耶魯讀博士，讀完之後，在美國求職四處碰壁，也曾一度考慮要不要回香港或臺灣，後來還是留在美國，開始了他的事業。所以，對夏志清來說，這更多的是一種被動的選擇。而對夏濟安來說，更多的則是一種主動的選擇。無可諱言的是，夏濟安對共產黨政權充滿疑慮，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不抱希望，所以他選擇了離開北京，到香港，再到臺灣。他最初甚至以為，很快就能重新回到上海，回到父母的身邊；但很快就意識到，他是回不去了。從此，兄弟倆一個在美國，一個在臺北，開始了各自的離散飄泊。顯然，或被動或主動的選擇，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是幸運還是不幸，其實很難說。一九四九年以後，以夏濟安這樣的立場，如果還在大陸，大概難逃厄運，也就不可能在臺北為臺灣現代文學奠定基礎；夏志清如果選擇回到大陸，也不可能寫出《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的著作，甚至開創了英語世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傳統。歷史不能假設，我們永遠只能後知後覺。

夏志清一心問學，主要精力都花在讀書和研究上，對文學創作或翻譯一直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他在學術上的造詣與貢獻，顯然遠遠高於夏濟安。夏濟安是個多面手，翻譯、創作、研究、編輯，無一不能，書信中留下了大量相關的線索。現在學界最熟悉的夏濟安是《黑暗的閘門》的作者，是左翼文學研究大家，其實夏濟安志不在此，他最大的興趣還是寫作。書信中夏濟安不斷討論他的小說創作，有中文，也有英文的，比如〈蘇麻子的膏藥〉、“The Birth of a Son”等。他對自己的小說還頗為自負，很可惜，後來他迫於生活，很難再有更多的時間施展他創作上的才華。夏濟安如何在小說中處理其「離散經驗」，實在難以想像。倒是在學術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夏氏兄弟「離散經驗」的痕跡。《黑暗的閘門》在英語世界首開對左翼文學的研究，對左聯、對魯迅都提出了完全不同於大陸學界的看法。當時大陸的魯迅形象依然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夏濟安一九五九年就發表了〈魯迅和左聯的解散〉，後來又發表〈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方面肯定魯迅的現代性，認為魯迅是個天才，有洞察一切的才智，有非常漂亮的文字功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混合著天堂與地獄的音響。這樣的評判顯然是驚世駭俗的，如果不是他身處海外，完全是不可想像的。同樣地，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

張天翼等人的重新發現，催生了後來的張愛玲熱、沈從文熱，甚至改寫了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格局。在夏氏兄弟的學術研究中，我們也許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離散經驗」的投射。

這部《書信集》，我感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做評說。一是作為情感史來看。曾經有學者專門研究《兩地書》中的情感表達，梳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情感譜系，現在夏氏書信完全可以置於其中加以考察。特別是夏濟安的情感史，實在是無比豐富而又令人唏噓。他喜歡了一個又一個的女生，從董華奇到劉璐到秦佩瑾，再到 Ruth 等等，不斷經歷著各種情感的迭宕起伏，最後還是一事無成。夏濟安也不斷地對自己進行心理分析，既自負，又自悲，對感情既有明確的渴望，又隱隱畏懼，最後總是以失敗告終。夏濟安不斷追求女友卻又不斷失敗的經歷，似乎也透露出這一代讀書人在大時代的巨變中，惶惶不安的心理徵象。相比而言，早年的夏志清一心向學，無比孤獨，一直到遇上 Carol，才有了真正的戀愛體驗。此外，兄弟二人不斷地談論各個電影明星，沉緬於電影的想像中，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青春欲望的情感投射。這些內容，我們不妨都可以從情感史的角度進行深入的心理分析。

二是作為學術史來看。從夏志清早期的書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耶魯所受西方文學的系統訓練，他不僅親炙布魯克斯、藍遜、燕卜遜等理論大家，而且系統扎實地大量閱讀西方文學，甚至讀遍了英國文學史上幾乎所有大詩人的文集。以這樣的學術訓練，陰錯陽差地進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他寫出來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自然就不同凡響，因為他的評價標準是西方文學的大經大典，是將中國現代文學置於世界文學的語境中加以評析。這些書信，為我們重新討論夏志清與西方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比如我們都說夏志清深受利維斯的影響，書信中就能看到，他一九四九年就讀到了《偉大的傳統》。我們完全可以把書信中關於小說史寫作的相關內容，拿來與《小說史》進行比較性的發生學研究。此外，還可以看到，夏濟安最早討論《蜀山劍俠傳》是在第七十六封信中，由此開始了他對通俗文學的思考，還有他關於《文學雜誌》的編輯、小說散文的翻譯等等內容，都是研究臺灣現代文學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文獻。更不用說，書信中還涉及相當多的漢學家和當年學界的情況，甚至還有「學術八卦」（比如《駱駝祥子》英譯者的英文小說其實是抄襲改寫自趙樹理的小說等），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學術史的「歷史細節」。

三是作為文化史來看。書信中大量涉及歐美電影、影視明星，幾乎為我們還原了當年西方電影拍攝、上演、傳播的基本面貌，成為研究影視文化的重要例證。關

於 Miss Rheingold 啤酒小姐、Mardi Gras 等節日的記載，還有各種刊物、圖書的資訊，也為我們打開瞭解美國文化一扇又一扇的視窗，甚至書信中的穿衣吃飯、服裝品牌、生活用品，都真實記載了那一代人的生活常態，完全可以從文化史的角度加以梳理。

總之，《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是一部離散之書，溫暖之書，感動之書，值得我們反覆閱讀，細細挖掘。因此，我們更加期待以後各卷的早日問世。

二、夏志清的文學觀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獲悉臺灣中央研究院將召開「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當即報名參加；只是一直拿捏不準會議主旨到底是「紀念」，還是「研討」。二者雖有聯繫，但發言姿態不一樣。主辦方大概希望兼及理智與情感，故如此命名，可對於像我這樣既認真又沒有急智的人來說，則頗感為難。隨著時間臨近，議程表終於出來了，發現與會各位都沒有論文題目，這才確認是以紀念為主。

不是老友或門生，連私塾弟子都算不上，我與夏志清先生實際接觸不多，主要是讀其書，賞其文，然後遙想先生風流。一九九七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那四個月，多有請益；還有二〇〇五年十月參加「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再來就是二〇一一年到哈佛及紐約大學參加學術會議，順便登門拜訪。正在思考如何落筆，先是臺大教授梅家玲發來「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合影，擺明她將談及此事；後有妻子夏曉虹查閱當年日記，確認我們與夏先生交往的若干細節，且交代不能利用議程上的優勢「捷足先登」。交往不能說，那我只能說讀書了。

二〇一〇年聯經出版公司刊行王德威主編《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副標題是「向夏志清先生致敬」。據說夏先生拿到新書，興奮之餘，突然冒出一句：「怎麼只說我的現代小說研究？」我提交給此書的舊作〈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倒是提及夏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導論》(*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可惜限於文章篇幅及體例，只是點到為止。不過，無論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聊天，我都曾認真表揚這部篇幅短小但別出心裁的「導論」。因為，導論性質的書不好寫，需要高屋建瓴，舉重若輕，還得於詳略、取捨之中，突顯自家的眼

光和趣味。其中分寸感的掌握尤其要緊，所謂高低雅俗，往往就在字裏行間。

一九九七年春夏間，應美中學術交流基金會的邀請，我偕妻子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做研究。因王德威教授的鼎力推薦，夏志清教授對「本家」夏曉虹及我非常熱情，多次宴請，並出席我的學術演講等。在這幾個月的請益及交流中，我談及自家閱讀《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的感受，讓夏先生大為快意。與國內外眾多古典小說專家的立場不同，我因此前撰寫《中國散文小說史》（初版題為《中華文化通志·散文小說志》），深知以有限篇幅，言簡意賅地談論「中國小說」這個大題目，不是件容易的事。談到得意處，夏先生慨然允諾，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此書中譯本。只是日後因譯者選擇，以及如何協調新舊譯本，面臨一些實際困難，此事未能如願。

二〇一三年年底夏先生去世，獲悉噩耗，第二天我便趕寫了〈追憶夏志清先生：「小說三史」〉（刊香港《明報》2014年1月3日）。為什麼是「小說三史」？作為學者，夏志清最著名的著作無疑是《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此書特色鮮明，功績顯赫，常被中外學界及媒體掛在嘴上，自在情理之中。在北大及港中大的課堂上，我都再三提醒學生們關注夏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開始進入晚清小說研究領域，讀夏先生的《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老殘遊記新論》、《玉梨魂新論》等，深受啟示。我知道，夏先生還有若干談論清代小說或清末民初小說的論文，只是散落在各種中英文的集子，若能集合起來，說不定能與「古典」與「現代」兩本小說史「鼎足而三」。對於如此建議，夏先生連說「深得我心」，只是有些篇章尚在醞釀中，不想就此打住。

很可惜，夏先生最終沒能完成此書。但我相信，借助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刊行的《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2004），以及他的若干中文集子（如：《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新編一冊「小說史論集」，奉獻給中國讀者，還是可以做得到。

這或許真的是夏先生未完成的「遺願」。為什麼這麼說？為參加此次會議，我翻箱倒櫃，找到了夏先生三封來信，主要是商談在北大刊行《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中譯本的具體事宜。其中，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的長信最要緊，密密麻麻寫了四頁紙。此前我曾建議北大版《中國古典小說導論》添加若干近代小說論文，夏志清先生覆信稱：「謝謝你們把我的著作推薦給北大出版社。我自己曾在北大當助教一

年(1946-1947)，能在北大出書，更感到光榮。『繼而感歎當初』沒有寫篇中譯本新序，可引起國內讀者對此書的注意，因此出版後未像《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的受人重視，遺憾頗多。」下面談及他對胡益民等譯本的看法，希望採用他正在修訂的聯合文學出版社的譯本。但話鋒一轉，又說考慮到聯合文學出版社很可能出於銷售考慮，不同意轉讓版權；而胡益民等譯者當初在兩岸隔絕的狀態下，主動譯介此書，很讓他感動。於是我建議，北大版採用胡譯本，再添上他準備撰寫的新序。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夏先生來信：「此序早應該寫出，《張愛玲給我的信件》仍在《聯合文學》連載，我一心不能兩用，待《信件》刊畢後，再寫新序不遲。」除了自家新序，夏先生還拉上作家白先勇，請他為《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寫篇文章——北大版有此二文助陣，「當可得到廣大的注意」。同年六月十二日，夏先生又有指教：「好友白先勇已為臺版《古典小說》寫了一篇一萬三四千字的推介之文，我已過目，標題為〈經典之作〉。屆時我也把此文寄上，請兄代為發表。先勇在國內名氣很大，拙著當可更引起學界注意也。」

可惜的是，夏先生晚年為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3年；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傾注全力，加上身體日衰，終於沒能顧及舊書重刊一事。時至今日，臺版《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仍在校訂中。

事情沒辦妥，但夏先生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信中談及的新書構想很重要，值得大段引錄：

安徽版《導論》一共三七九頁，但注釋部分字體太小，看起來太吃力，不妨用大一兩號的字排印較妥。這樣，全書當在四百頁以上，算是一本相當厚重的著作了，似不宜再加別的文章。全書是一個整體，在同一段時間內寫出的。我其他論中國小說的文章上除了大函上提到的三篇（嚴梁、老殘、玉梨魂）外，還有其他諸篇，可以出本專書。有關古典、近代的有：

《隋史遺文》重刊序

文人小說家與中國文化——《鏡花緣》新論

中國小說、美國評論家——有關結構、傳統和諷刺小說的聯想

Plaks《紅樓夢》專著長評見哈佛學報

此外論湯顯祖那篇也可放入。……

重讀夏先生十八年前的大劄，更加堅定我的信念，若能得到師母的支持，為夏先生編一冊兼及古今的《中國小說史論》，自信是件大好事。

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

我的題目是「夏志清教授的文學觀——從香港張望」，主要是跟大家報告夏先生的著述在香港流通的情況。現在所知夏先生最早的英文著作，是一九六一年初版的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71年再版，1999年三版）和一九六八年的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68年出版）；這兩本英文書，奠定了夏先生在歐美漢學界的權威地位。至於二〇〇四年出版的 *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Sixteen Essays and Studies*，則是夏先生退休後編整歷年重要學術論文，合成一集。前二書以及夏先生其他文章，透過中文翻譯，影響到廣大華文地區的中國文學研究。所謂「從香港張望」，其實是以我個人有限的知見為基礎。事實上，我和我的同學朋輩，主要是從中文開始接觸夏先生的著作。

夏先生第一本中文著作《愛情·社會·小說》出版的時間是一九七〇年，但裏面收錄的文章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已先在臺灣的雜誌刊載。依夏先生的說法，他到美國留學以後撰寫的第一篇中文文章，就是與文集同題的〈愛情·社會·小說〉；不過，夏先生最早刊登的中文論文，卻是另一篇，夏濟安先生從《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原稿翻譯過來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刊於一九五七年六月《文學雜誌》的第二卷第四期。以結集成書的次序來說，《愛情·社會·小說》之後便是一九七四年的《文學的前途》、一九七七年的《人的文學》、一九七九年的《新文學的傳統》。這幾本臺灣出版的文集，很快就流通到香港。

同在一九七九年，《*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中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在香港和臺北兩地正式面世。這本書的重要性已是無可置疑，在此不必詞費。中譯本由劉紹銘先生與同道據英文原著第二版譯出，香港由友聯出版社出版，臺灣則由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兩個版本相較，香港版本似乎稍占優勢，因為當時臺灣出版還有點顧忌，在文字上有所修飾。理所當然，我買的是友聯的橫排本。後來，在不同華文地區陸續有重排重編的版本出現；最新的應該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二〇一五年一月所出。

一九八三年，香港出版了夏先生文章的選本《印象的組合》，屬於劉以鬯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叢書》之一。劉先生主編這套叢書的眼界很開闊，包括了師陀的《惡夢集》、楊絳的《倒影集》，以至西西的《交河集》、葛浩文的《漫談中國新文學》等。其後臺灣又在一九八四年出版《雞窗集》、一九八七年出版《夏志清文學評論集》、二〇〇四年出版《夏志清序跋》。二〇〇六年在大陸又有陳子善先生編

的選本《歲除的哀傷》，香港則有劉紹銘先生主編的《談文藝、憶師友》。《談文藝、憶師友》後來也有臺灣和大陸的版本。

接下來要談的是我個人在閱讀夏先生著作的歷程中，最感興趣的部分。

我閱讀夏先生著作，最早是《文學的前途》，之後是《人的文學》，然後再回頭讀《愛情·社會·小說》。事實上，從這幾本書都可以看出夏先生的學風，以及他對文學與人生的關懷。讀《文學的前途》，其實就是開始讀中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因為當中好些文章就是《中國現代小說史》部分章節的中譯；例如《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第一章〈文學革命〉，以及屬於第八章的〈沈從文的短篇小說〉等。至於《人的文學》吸引我的，正是與書同題的〈人的文學〉一文。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七六年底，當中對周作人的論述，跟《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文學革命〉一章已有不同。夏先生在《小說史》中批評周作人觀念偏狹，但到撰寫〈人的文學〉時，對周作人文學觀念中的「寫實主義」與「人道主義」，就有更深刻的體會；他更稱賞胡適、周氏兄弟等「在古書堆裏追尋可以和自己『認同』的思想家、文學家」，以建立中國文學的「真傳統」；這個觀點往後在一九七九年的《新文學的傳統》一書中有所延續和發展。《人的文學》還收錄到一篇相當「多汁的」(juicy)〈勸學篇〉，與顏元叔筆戰；這篇和相關的〈追念錢鍾書先生〉一文，對在中西文學批評門階前徘徊的我，實在別具一種魅力。

至於《愛情·社會·小說》一書，裏面收錄了夏濟安先生翻譯的〈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二文；這是奠定「祖師奶奶」文學史地位的經典評論，當然重要。書中另外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該文其實在一九六七年時已經發表，後來收入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的一九七一年第二版作附錄；中譯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丁福祥與潘銘桑，本是為劉紹銘主持的中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而作，先在一九七〇年的《純文學》第八卷第三期發表。夏先生的重要文學觀念“Obsession with China”被譯成非常傳統的熟語「感時憂國」，看來很雅純，但其實並未準確把握原義。夏先生文章的副題則提醒我們，他的重點是中國現代作家背負的道德重壓，他們身心陷於其中，不能自拔；用夏先生的話來說，原意「更強調作家們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的現象占其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作家的責任」(見〈人的文學〉)。這個觀念或者我們可以用「情陷中國」、「情迷家國」等語翻譯；我在二〇〇五年王

德威教授主持的「夏氏兄弟與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上，就提出這個想法（拙文題目是：〈情迷中國：李英豪與香港現代主義的國族想像〉）。

正如前說，一九七九年的《新文學的傳統》一書的立意與題旨，其實銜接〈人的文學〉而來。「新文學」原來是「反傳統」的，「新」與「傳統」是對立的；但夏先生說「人的文學」代表的人道關懷，為「新文學」立下一個「傳統」，《新文學的傳統》的〈自序〉指出這是「有別於士大夫文學那個傳統的傳統」。不過，夏先生又說這「新文學的傳統」可以「不單指現代文學，也包括了屬於同一傳統的古代文學」；「我們認為中國的文學傳統應該一直是入世的，關注人生現實的，富有儒家仁愛精神的，則我們可以說這個傳統進入二十世紀後才真正發揚光大，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夏先生對「文學傳統」的閱讀是很值得深思的。究竟這是一種斷裂的史觀，還是一種連續的史觀？究竟我們是在現代回顧過去，還是從認識古代來理解現代？《新文學的傳統》的第一輯標題是「新的傳統」，包括〈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以及〈《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序〉三篇，合而觀之，很明顯見到「現代性」思辯的爭執。正是在這個場域之內，我們可以重讀司馬長風與夏志清的文學史辯論；也因為讀了夏先生的評論，我後來才會寫成〈詩意與唯情的政治〉一文，探討一九七〇年代司馬長風在香港書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意義。

接下來我想談談一般討論夏先生文學觀時比較少提到的《美國文學批評選》。這本書的編者是林以亮，由今日世界出版社於一九六一年出版。由於本書背後的出版資金源自香港和臺北的美國新聞處，所以可供討論的層面很多；但現在我不打算對當時的「文化冷戰」等問題做詳細討論，只想指出這書在很大程度反映了夏志清先生的文學觀點。林以亮在〈序文〉結尾說：「這本書之所以能夠面世，可以說是由夏志清兄所促成。這本書所選各文的基本名單也是根據他的建議而定。沒有他的鼓勵，寶貴的意見，和不斷供應參考書籍，我不能想像這本書有今天這樣一個形式。現在我願意在這裏向夏志清兄及其他友人表示謝意。」我們再檢視全書的編次，看到當中有不少作者是夏先生在耶魯大學讀書時期的老師：如博士論文導師博德(F. A. Pottle)，接引他到耶魯的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耶魯名教授威利克(René Wellek)等，布魯克斯與威利克固然是被歸入「新批評」體系的批評家，相關的入選者還有艾略特(T. S. Elliot)，以及泰德(Allen Tate)和華倫(Robert Penn Warren)。另一方面，書中收入的文章也包括來自「新人文主義」的白璧德(Irving

Babbit)，重視文學之社會意義的屈靈 (Lionel Trilling)，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威爾遜 (Edmund Wilson) 與若夫 (Philip Rahv) 等。我們往往以為夏先生在耶魯這個「新批評」大本營出身，應是堅執的「新批評家」；但從他策劃的文選卻看到更廣濶的批評視野。尤其我們要注意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博德並非「新批評」中人，入選的兩篇文章：〈甚麼是詩〉和〈批評之相對論〉，都選自他的重要理論著作《詩之成語》(The Idiom of Poetry, 1941; 1946 2nd edition)。此書的第一章是〈敏感度的轉移〉(“The Shift of Sensibility”)，其實構成了夏先生編選此書甚至一貫批評論述的基礎。例如，他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給夏濟安先生的信就說：「我們討論中國文學時，對於為什麼某個時代有一種特殊的 sensibility，一種特殊的 idiom，可用歷史背景說明。可是，說到這時代作品的本身，最後的標準似乎只有『成熟』、『豐富』(richness) 等簡單的 concepts。」可見夏先生正在把老師的觀念帶進他的文學思考當中。此外，林以亮在〈序文〉中，提到要藉編這本書的機會「利用這些文章來介紹現代人對文學的『新的敏感』(Sensibility) 和現代文學批評所採用的『新的方法學』(Methodology)」。其說很可能是得自夏志清先生，因為「新的敏感」和「新的方法學」這兩個方向，應該就是他兩位老師博德與布魯克斯的文學觀念之並置。職是之故，我想提醒夏先生著作的研究者，有必要從一個更寬廣的基礎去理解他的文學觀念。

以上匆匆道來，疏漏一定很多，請各位方家多多批評指正。

張淑香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我真正與夏先生有所接觸，已經是接近二〇〇〇年，他的晚年了。在此之前，當然不乏諸多有關夏先生異人異事的傳聞。儘管如此，我一向是個只相信自己眼見耳聞的人，不輕易為成見成聞所左右。我所見到的夏先生，果然與傳聞的印象很不一樣。也許因為此時他已垂垂老矣，無復當年。生命是很奇妙的，會隨著人生的歷程而不知不覺產生變化。晚年的夏先生在我眼中，只是一個親切、直率、隨和、溫暖的長者。我自認不是一個平易近人的人，初次見面，卻沒有陌生感。我先後好幾次到紐約，夏先生和夏師母都會請我吃飯。最長一次是在哥倫比亞大學逗留了半年，所以有機會多次與夏先生、夏師母、商偉、彭昕一起聚餐。夏先生說起話來非常痛快，好惡分明。有時口不擇言，頗像老頑童。他的胃口比我們年輕人還好，餐桌上的氣氛總是興致高酣。吃完飯就一起散步去坐地鐵，走路時或過馬路，偶爾他

會牽著我的手，對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什麼人會覺得這有不妥當呢？我想暢所欲言即無壓抑，老尚能飯食慾佳，應是夏先生高壽的主因。當然，還要加上他每天規律的散步，以及客廳桌上擺滿的維他命和養生健康食品。在這方面，夏先生卻又頗有自制與紀律的。

有一次我們大家一起去觀賞張繼青表演崑劇《爛柯山》。當舞臺上演到〈癡夢〉木匠張西喬持斧欲砍崔氏這一幕時，夏先生竟然忽地站起來大叫：「哎呀！」當時坐在他鄰座的我，簡直嚇呆了。忙著和夏師母請他坐下，也不敢東張西望看看滿堂觀眾對此如何反應。看戲竟可如此入戲，可見古代記載有人演《牡丹亭》尋夢而死於舞臺上，或有人看戲入神而衝上舞臺，並非虛話。夏先生的這件趣事，再次讓身歷其境的我，感覺到他有如孩童般單純天真的一面。一般常人是不可能如此忘我忘物，直感直出，置現實於絕緣的狀態。我心想難道這就是「返老還童」嗎？所謂「返老還童」可能就是生命的螺絲漸漸鬆動了，自我知覺與控制的力量也不由自主薄弱了。但印證人們對夏先生過去的種種傳說，我想像夏先生人格中具有一個特點：他可以罔顧一切、毫無禁忌、率意勇敢地做自己。不管別人如何看他說他，他都可以全無遮掩地為所欲為、言所欲言、任情任性。無論是正面的負面的，敢做敢說。反觀學術界不乏虛假偽飾的男男女女，敢於做真實的自己人實在太少了，真率而具有爭議性的夏先生，豈非標識著一種「另類」的誠實與勇氣？就此而言，他委實是學術界的一個傳奇人物。對我而言，他無疑是一個性情中人。

夏先生還有一點令我頗為敬佩，那就是他的反共言談。人們或許會因為時代改變了，此一時彼一時，而認為處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他的反共言談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人會因為政治因素，刻意避免說到夏先生在這方面的立場與表態。但我卻不認為這純是由於時代使然，而更是一個人格的展現。試問，即使在他的時代，敢於挺身高唱反共言論的人，又有幾個？夏先生的反共言談正呼應他直感直出，敢說敢為的率真性格特徵。正因為他是一個性情中人，才會展現這種道德勇氣。反共意識是一個知識分子對正義的認知與抉擇，也是個人的道德勇氣及人格的堅持，這種人性精神的揮揚，具有高闊的普遍意義，是普世的價值，自然超越任何時空的限制。我是如此閱讀夏先生的反共言談。

我所言說的夏先生，或許與傳說的版本有所不同。在人生的道途中，人與人會遇的時間點頗是微妙。我很慶幸我所見到的是晚年的夏先生。在我的心目中，他始終是一位溫暖的長者。

三、夏志清的小說史

陳子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員）：

參加「夏志清先生紀念研討會」，與夏師母、夏先生的友人、學生和同行相聚，共同探討夏先生多方面的學術貢獻，我深感榮幸。

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第一部用英文撰寫的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學術專著，在英文世界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也是二十世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眾多著述中極具個性和創見的著作，對一九八〇年代以降中國大陸「重寫文學史」的過程中，產生重大的影響。《小說史》的學術價值和歷史地位，以及對「小說史」的「洞見」和「不見」，海內外已有眾多論述，限於時間，我只談一個具體問題。

《小說史》第十九章也即「結論」部分，在討論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時，有四個注釋，其中第三個注釋中有這樣一段話：

今日共產中國所出版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最具雄心的，當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1-1953)和劉綏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前者雖較早出版，但兩相比較之下，劉氏著作偏重於不太出名的共產作家，把好多重要作家給省略了。王瑤雖然不贊同沈從文、周作人、林語堂及師陀諸作家，但在他這部書中還討論到他們的著作。¹⁰

這段話說明夏志清先生在撰寫《小說史》時，認真讀過王瑤先生和劉綏松先生的這兩部文學史著作。不僅如此，《小說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已經在大陸問世的另兩部文學史著作，即丁易先生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和張畢來先生同年十一月出版的《新文學史綱》第一卷，夏先生也都認真讀過，並在《小說史》正文中加以引用，或在注釋中做出回應。因此，在我看來，他寫這部《小說史》有一個目的，就是對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包括王、劉、張、丁四位先生的在內，有所梳理、有所批評，並力求有所超越，可見得夏先生更具雄心。

《小說史》這個注釋中的一句話值得注意：「王瑤雖然不贊同沈從文、周作人、林語堂及師陀諸作家，但在他這部書中還討論到他們的著作。」主持《小說史》中譯的劉紹銘先生，一九七八年為《小說史》中譯本所寫的引言〈經典之作〉中，曾

¹⁰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68。

把王瑤、丁易、劉綏松三位文學史著作中對許地山的評價和《小說史》對許地山的評價做過有趣的對比。受此啟發，我也嘗試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把《小說史》和王、丁、劉等文學史著作，以及《小說史》之後出版的唐弢先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對沈從文的評價略做對比。

王瑤先生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第二編「左聯十年」第八章〈多樣的小說〉第三節「城市生活的面影」中討論了沈從文，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

沈從文的小說產量極多，長短篇有三十餘種。他最早是寫軍隊生活的，但寫的也多是以趣味為中心的日常瑣屑，並未深刻地寫出了兵士生活的情形。接著就寫以湘西地方色彩為背景的原始味的民間生活和苗族生活的作品……作者著重在故事的傳奇性來完成一種文章風格，於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許多懸想的野蠻性，而且也脫離了它的社會性質。他採用的多是當作一種浪漫情調的奇異故事，寫法也是幻想的。後來這種題材寫窮了，就根據想像組織童話及舊傳說了，以文字的技巧來傳達一個奇異哀豔而毫無社會意義的故事。……他的文字自成一種風格，句子簡練，「的」字用得極少，有新鮮活潑之致……但作品中不注意寫出人物，只用散文漫敘故事，有時很拖遑。¹¹

丁易先生一九五五年七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第八章〈革命文學作家、進步作家以及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學流派〉第三節「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學流派」之第三小節「新月派及其他」中也討論了沈從文，卻上綱上線，進一步否定了沈從文：

在〔沈從文〕大量的作品中，作者所寫的範圍相當廣泛：有士兵，有農民，有地主，有紳士，有少數民族生活……不過廣泛雖然廣泛，但這些人物在作者的筆下，都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作者的觀念的化身。……作者製造了這樣的一個觀念的世界，一個適合於地主階級的觀念世界，當然，這世界只是地主階級的幻想而已，現實中是不會有的。但是，在這裏也就十分露骨地表現出作者的濃厚的地主階級意識。……至於在寫作技巧方面，作者是特別注意的，他苦心孤詣的在故事的敘述上安排著一些濃厚的但卻是低級的趣味，用一種最適合於體現這趣味的輕飄飄的文體表達出來。¹²

¹¹ 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頁236-237。

¹² 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頁289-290。

而在第四章中談到抗戰後期和戰後的文學運動和文學理論之爭時，丁易先生更這樣寫道：一些反動文人如沈從文、徐訏之流，寫了許多色情墮落的作品，企圖麻醉青年，阻撓進步。

劉綬松先生一九五六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沈從文的名字已然消失，他的作品不再進入作者的研究視野。但在下卷第五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中，則引用了邵荃麟批判「反動文藝」的一段話，其中有一句「朱光潛、梁實秋、沈從文之流的『為藝術而藝術』論」，或可見作者對沈從文的基本態度。

唐弢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九六四年寫出內部討論稿，但遲至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才在大陸正式出版，共三卷。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卷中，第十一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創作（二）〉之第五節「其他作家作品」中，也討論了沈從文，把沈從文與王統照、魯彥、李劫人、李健吾等相提並論，對沈從文的評價與王、丁等相比，也有了一些改變：

他的代表作中篇《邊城》，描寫一個撐渡船老人的孫女和當地掌水碼頭的團總的兩個兒子之間的愛情故事，借助這一纏綿曲折的情節來描繪湘西地區的生活「寧靜」和「民性淳樸」。……整個作品充滿一種牧歌情調。這部中篇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關於當地人民的傳統生活風習也能寫得優美動人，藝術上別具一格……但就沈從文創作的根本傾向而言，總是有意無意地回避尖銳的社會矛盾，即或接觸到了，也加以沖淡調和。作家對於生活和筆下的人物採取旁觀的、獵奇的態度；對於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缺少憤怒，從而影響了作品的思想藝術力量。¹³

有意思的是，除了劉綬松先生對沈從文隻字不提，王瑤、丁易和唐弢三位先生的文學史著作對沈從文的評述，字數竟然差不多，王瑤是七百多字，丁易是九百多字，唐弢也是九百多字，似乎是不約而同。以如此吝嗇的篇幅討論沈從文，乃至完全無視沈從文的存在，以今天的眼光視之，當然有點不可思議。我無意於苛求前輩，但這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史實。

有必要補充的是，唐弢先生在五年之後，也即一九八四年三月，又出版了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書中對《中國現代文學史》關於沈從文的部分做了

¹³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280。

明顯的修正，刪去了批評沈從文的那些話，並提出沈從文是「文體作家」的看法，討論沈從文的篇幅也增加到了二千三百餘字，這當然是一個進步。

然而，相比之下，夏先生的《小說史》在第二編「成長的十年」中，以第八章整整一章的篇幅詳細而深入地討論沈從文，在第三編「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的第十四章〈資深作家〉中，繼續討論沈從文，單就篇幅而言，就占了總共二十三頁，約二萬餘字之多。與王、丁、唐（包括後來的修正版）比較，差距之大，足以證明《小說史》獨到的藝術眼光、廣闊的文學史視野和前瞻性，也完全符合作者所主張的「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給後來的研究者以諸多啟示。夏先生對沈從文的總體看法，下面一段論述也許可以概括：

沈從文在中國文學上的重要性，當然不單止建築在他的批評文字和諷刺作品上，也不是因為他提倡純樸的英雄式生活的緣故。他對現代中國文學和生活方式的批評，固然非常中肯，非常有見地；他對人類精神價值的確定，固然切中時害——但造成他今天這個重要地位的，卻是他豐富的想像力和對藝術的摯誠。我們若把他早期的小說，拿來和它們後來的改正本（沈從文是現代中國作家中唯一有改寫習慣的一個），或者其他三十年代的成熟小說，互相比較一下，那麼，令我們感到驚異的，不單是他藝術方面的成長，而且還有忠於藝術的精神。在他成熟的時期，他對幾種不同文體的運用，可說已到隨心所欲的境界。計有玲瓏剔透牧歌式的文體，裏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這是沈從文最拿手的文體，而《邊城》是最完美的代表作。此外還有受了佛家故事影響的敘述體，筆調簡潔生動。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他模仿西方句法成功後的文體（他早期也模仿過，但不成功，這點我們在前面提過了）。他對這種文體的處理，花了很大的心機。¹⁴

至於《小說史》對沈從文小說藝術成就具體而精湛的分析，以及《小說史》用更多篇幅詳細論述王、丁、劉、唐等文學史著作中根本未曾涉及的張愛玲和錢鍾書，想必在座諸位都已十分熟悉，不必我再費辭了。

當然，《小說史》也留下了一些遺憾。《小說史》在討論一九三〇年代「兩蕭」即蕭軍、蕭紅的創作時，對蕭紅只有短短的一句話：「蕭紅的長篇《生死場》寫東北農村，極具真實感，藝術成就比蕭軍的《八月的鄉村》高。」雖然評價不低，

¹⁴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157。

畢竟太過簡略。《小說史》出版後，夏先生在一九七四、七五年間「生平第一次有系統地讀了蕭紅的作品，真認為我書裏未把《生死場》、《呼蘭河傳》加以評論，實是不可寬恕的疏忽」。這是他《小說史》中譯本序中的原話。他後來又數次提到此事，並且斷言：「我相信蕭紅的書，將成為此後世世代代都有人閱讀的經典之作。」二〇〇一年夏，我與夏先生在紐約第二次見面，他也當面向我表達過《小說史》未及討論蕭紅的遺憾。夏先生對《小說史》中蕭紅基本缺席的自我反思，對蕭紅文學史地位的高度肯定，進一步說明夏志清先生忠實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展示了這位文學史家的廣大胸懷，也提醒我們《小說史》其實是包容的，開放的。

夏曉虹（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讀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很早，而且記得看到的，就是一九七九年九月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的初版，黃色封面，大開本（相對於大陸當時流行的小三十二開本而言）。此書來自何處已記不清，按說北大圖書館的購書速度不會如此迅速，現在想來，應是樂黛雲老師以私人藏書出借。當年我們是大學二年級學生，正在上「現代文學史」課，讀書和聽講恰好可以對照進行。印象很深的是，書中有一些我們的文學史課程中不會講到的作家，如現在已如日中天的張愛玲與錢鍾書。而且，我們的課上雖然也講到吳組緇先生的作品，但那多半是因為吳先生也在中文系任教，是我們老師的老師，介紹他早年的創作，實在帶有致敬的意味。看了夏先生對吳先生小說的解讀，還是會發現不一樣的觀察點；我們課堂上肯定的，在夏先生那裏可能正是批評。這種對比很有趣，也打開了我們的眼界。

見到夏先生本人則是將近二十年後，即一九九七年三月。那年由王德威教授安排，我和陳平原一起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學，在紐約逗留了四個多月。查了日記，和夏先生見面是在抵達後的第三天，由德威兄做東，一起吃午飯。我們的住處距夏先生家大概只隔七、八條街，算是很近了。不過，登堂入室還是在我們即將離開美國的前三天，夏先生在一家江浙菜館為我們餞行，飯後即到夏府聊天。那天打擾夏先生很久，晚上十點才告辭。而無論在哪個餐館，因夏先生小費付得多，每次都是百分之二十，所以每到一處，總是賓至如歸，很受侍應生的歡迎。

除了蹭夏先生的飯，我們對夏先生也算小有貢獻。因為當時哥大設有「夏志清紀念講座」——我想，這是德威兄的功勞，三月三十一日，原先所請的主講嘉賓

突然生病，早上德威兄打來電話，邀我們客串，我們即匆忙準備上陣。午後四點開講，平原的題目是「中國小說諸面相」，我講「晚清對經典的重新詮釋問題」。夏先生神采奕奕，全程參與，且準備了相機。他為平原拍的一張演講照片我們非常喜歡，後來作為平原的最佳講課留影，曾經在好幾年裏不斷提供給各方，直至原照丟失。當晚，夏先生很高興地在他常去的一家越南餐館請客，如此看來，我們的救場效果尚可。

七月十一日，離開紐約前的送別宴上，夏先生特意將七幀講座照片洗印後饋贈。在其中一張合影背面又加題識：

平原曉虹 1997年3月31日在哥大演講之前，攝於420 Kent Hall，王德威的辦公室，當年也是我的辦公室。

北大來的二教授即將返京，以照片數幀相贈留念，並望能保持聯絡。

受到如此鄭重的款待，可以想見我們當時內心的感動。回到北京後，曾給夏先生去信。夏先生回覆過三次，雖患有青光眼與心臟病，夏先生的信卻寫得極其認真。第一封落款為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兩張哥大的信紙，正反兩面寫滿，最後還說「紙滿不盡言」，可見夏先生待人的熱忱。此信主體部分是談《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在大陸的出版事宜。當時平原擬將安徽文藝出版社已出版的譯本請原譯者修訂後，加上三篇近代小說專論，推薦給北大出版社出版。夏先生對此頗感興趣，故信中有詳細的交代與討論。

對於我來說，最感親切的其實是下面這幾句話：

謝謝附來的照片，我也寄二位兩幀。照片上稱您們為「弟妹」，想不會見怪。以前大陸來的教授，感覺上總有些距離，只有你倆平易近人，而且所寫文章一無黨氣，最為可貴。曉虹同我想原是本家，如蒙不棄，以後信笥往來，真可兄弟、兄妹相稱也。

在夏先生來說，這番話是謙和待下、提攜後進；而本人愚執，竟認了真，回信時便放肆地以「志清兄」開頭。夏先生不以為忤，覆函徑直呼「平原曉虹弟妹如晤」，且對我們信賴有加。《中國古典小說導論》的修訂也委託我們全權處理：「弟妹如有暇把安徽版閱讀一遍，發現有文字不妥、不順處，即可加以改動，不必徵求譯者或作者之同意也。」但事後平原責怪我，自己想想也覺得如此稱呼實在不妥，便再也不敢如此僭越。

熟悉的人都知道，夏先生以愛護女生、憐香惜玉著稱。關照晚年張愛玲正是最

有名的一例。為此，夏先生有時也會被人利用，甚至不免吃苦頭，但他心甘情願，無怨無悔。我雖不是香、玉，但居然敢於使用這樣不恭的稱謂，日後想來，也未嘗不是憑恃著夏先生這一人性優點。應該也是看中夏先生對女孩子的有求必應，當年在哥大時，即聽到德威兄的幾位女弟子劉劍梅、Ann Huss 謀劃組隊參加美國亞洲年會，其中的一個亮點，正是邀請夏先生做 Panel 的主持人。不知後來此計畫是否成功，想來若非身體原因，夏先生應當是樂意玉成。

在此之後，還和夏先生相聚過幾次。最後一次見面是二〇一一年，我和平原到哈佛參加辛亥革命一百年的相關研討會，回程經過紐約，停留數日。事先也特意寫信告知夏師母，於是又叨擾夏先生請客。

十一月七日那天，我們先到哥大故地重遊，一位北大交流生一路陪同。傍晚五點半，她準時把我們送到了夏先生居住的公寓。當那位學生得知我們要拜訪夏先生時，口氣及眼神中滿是羨慕，讓我至今不忘。直到按響門鈴，夏師母下樓來接，我回身看去，那位學生還戀戀不捨地站在小馬路的對面凝望。我瞭解，夏先生在大陸學界是個神話，有幸走入這個仙境的人有福了。

夏先生的客廳中仍是滿滿兩牆書，只是沙發對面的書櫃上，多了一幅馬英九於年初夏先生九十大壽時贈送的「績學雅範」手書賀詞。夏先生仍是神采奕奕，談興甚濃。我們自然不會放過合影的機會，而且極為難得的是，照片中的夏先生表情豐富，這也成為我們此次美國之行最珍貴的留念。

只是，夏先生畢竟年事已高，行動不便。我們看到師母很熟練地推出輪椅，安頓夏先生坐好，才帶我們下樓，緩緩往哥大小館走去。送夏先生與師母回來時，我們也一如傍晚的那位學生，癡癡地看著他們進入亮起燈的大門，揮手道別，不捨得離去。

夏先生的研究領域很寬，古今中外通吃。而且，無論《中國古典小說導論》還是《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是眾望所歸的一代名著。我很幸運，在個人最關注的梁啟超這個人物上，也能夠和夏先生有交集。只是，一九八〇年代我在寫作《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時，尚無緣看到夏先生的《人的文學》，而收入〈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啟超〉一文的《臺灣·香港·海外學者論中國近代小說》一書，也遲至一九九一年方才出版。因此，當年沾沾自喜、以為頗具新意的一些論點，後來讀到夏先生此文，不免感到失落。儘管夏先生沒有我看到的史料那麼齊全，他主要依據阿英所編《晚清文學叢鈔》中的「小說戲曲研究卷」與四卷小說集

立論，但憑著天賦聰明（我們總可以聽到夏先生自我表揚「我太聰明了」），夏先生的論說已盡多洞見。諸如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所指稱的歐洲「魁儒碩學，仁人志士」撰著小說，「他心目中的首要人物必為李頓與迪斯雷利，也許還包括伏爾泰與盧梭」；「新小說」的創作受到日本政治小說的強大影響；末廣鐵腸的《雪中梅》開頭採用的慶祝日本國會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紀念日的政治預言，也對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楔子》中描述的中國維新五十年大祝典有示範意義；凡此，夏先生均已先我而言。

重讀此文，我對夏先生的學問與識見只有敬佩。

孔海立（美國斯沃斯莫爾學院當代語言與文化系系主任）：

首先，感謝會務組的邀請，讓我有機會來臺北參加這次紀念夏志清先生的研討會。今天我想與諸位學界同行分享的題目是「夏志清和抗戰時期的東北作家」。因為本人的博士論文是寫端木蕻良，我的導師則是研究蕭紅的葛浩文先生。在寫論文期間，他就讓我去向夏先生請教，於是我就和先生有了書信往來。一九九四年我去美國東部教書以後，與夏先生及其夫人王洞女士的來往更是頻繁。我們交談的題目很多，從文學電影到飲食審美，率性直爽的夏先生總是談笑風生，常常會用輕鬆詼諧的話語，把一些複雜的問題說得一目了然。

拜讀先生的《現代中國小說史》，以及近二十年的交往，讓我得益最多的，除了他的一些驚人駭世的獨到見解，主要還是他的審美原則和評論方法。

原則之一，就是夏先生的評論只注重文學品質，並不刻意注重作品的政治立場或作家所屬的派系，儘管夏先生處處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不然，他也不會有對左派作家張天翼的推崇和讚賞。再如，最先被介紹到英語世界的東北作家蕭軍和他的《八月的鄉村》，夏先生在《小說史》中，就只是把蕭軍放在左翼文學運動中的一種政治行為，和蘇俄軍事小說的仿作而已。最多把他放在魯迅的追隨者的脈絡中分析，因為素有匪氣造反精神的蕭軍，並沒有太多值得花費筆墨進行文學評論的價值。

原則之二，只注重創作者個人的貢獻，並不把作家個人和文學群體捆綁在一起。正因為這樣，他從來不用「群」字來概括抗戰時期的東北作家。他告訴我，寫《小說史》時，他手頭沒有什麼端木蕻良的作品。但這之後，仔細讀了端木的《科爾沁旗草原》，猶如愛玉者發現了一塊寶，興奮不已，於是夏志清分別於一九七四

年在波士頓和一九八〇年在巴黎做了專題發言，出人意料地超高度地評價端木的第一部長篇，認為端木的長篇，倘若能如期發表的話，應在同期作家茅盾和巴金之上。八十年代初期，他去大陸時，端木是他訪問的極少幾個作家之一。夏先生計劃要深入研究評價這位被遺忘，或長期被忽視的才子作家。遺憾的是因家事及健康因素的拖累，夏先生沒能如願以償。

我第一次遇到夏先生並談起端木最精緻的小說，應當在一九四〇年代，尤其是蕭紅去世之後。他極為興奮，馬上找出他收藏的端木四十年代的作品，以及他與端木的通信，並委託我編一部端木四十年代作品選。由於戰亂，有些作品連端木自己也沒有了。一年後，與夏先生合編的端木作品集《大時代》於一九九六年由臺灣立緒出版。總算了卻了夏先生的一部分心事。

除了端木以外，蕭紅是他一直想研究的作家。他被蕭紅吸引的主要原因，是蕭紅獨特的文學品質，並不是她的左傾意識。他在一次訪談中說：讀過蕭紅「你就發現蕭紅太厲害了，張愛玲下來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都是非常好的小說。後來我決定要寫蕭紅的時候，我找了柳無忌，……瞭解蕭紅的情況。這個時候，柳無忌告訴我，他的學生葛浩文也在將蕭紅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寫。我想要是我把蕭紅寫了，他就沒得寫了。所以，我最後沒有寫蕭紅，之後我還寫了書評捧葛浩文的這本關於蕭紅的書。結果大家都以為我沒有寫……但我可以說，在我之前，真沒有人寫過文章說蕭紅的好」¹⁵。

說來也真是巧，葛浩文和我師生二人，居然都在無意識中做了夏先生想做的事。葛浩文一九八〇年代首次出版的中文版《蕭紅傳》，以及隨後的多次再版，的確掀起了蕭紅熱，而且至今仍是大陸近年來出版的幾十部「蕭紅傳」當中，最被學界和蕭紅粉絲認可的一部。本人的拙著《端木傳》自一九九八年在臺灣業強首版之後，到上海復旦的二〇一一年版，先後出了三版，可算對端木研究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大概沒有完全辜負夏先生的期望。細想起來，葛先生和我在傳記中運用的把創作主體密切結合文本細讀的分析方式，似乎符合夏先生所推崇的文學評論原則。

原則之三，夏先生的文學評論是個人化的，天馬行空，實話實說，從不顧忌所謂規範，也從不在乎去衝撞流行的主流觀點。如劉紹銘教授的評價：「在黑白分明的界線上，我們的夏志清教授往往寧為『異端』，也爭著要講實話。」、「看來夏公

¹⁵ 石劍峰：〈夏志清：沈從文不改造自己〉，《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10月23日。

為說實話不惜出『惡聲』。」¹⁶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和夏先生說起蕭紅，我提出為何一九三六年蕭軍有了外遇，魯迅居然建議蕭紅去日本休養。難道蕭紅不是因為日本人占了東北才流亡南方的嗎？為何要在臨近中日全面戰爭之前，要去日本「休養」呢？不料夏先生一句驚人之語脫口而出：「墮胎嘛！」在一旁的夏太太連忙著急地說：「不能胡說，你有根據嘛？」夏先生毫不猶豫地說，誰不知道那時在日本墮胎是自由的，而且容易對國人保密嘛。當然這是先生的一個大膽的設想，但細想一下，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除了蕭紅以外，在夏先生未完成的作家裏，還有四川的李劫人。他告訴我，每研究一個作家，就一定要把他的作品全部讀完，也盡可能把所有的有關評論讀完，只有這樣，才有把握去寫出自己的觀點，才會對自己的研究有自信。當然做到這一點很累，他的體力不夠。這讓他深感遺憾。要不然，我相信，他一定會提出更多讓我們折服的新觀點。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正因為夏先生的這些遺憾，倒是為後代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的課題，這也應該是大家的福氣。

除了夏先生的原則以外，就是他評論的獨到方法。其一，是他的文學評論，與其說是評論，不如說是品味。他的分析以細節來說服人，他注意敘述的結構，場景的描述，特別是視覺感、音響效果、語言的生動、構圖的精緻等等。他欣賞的端木和蕭紅都嗜好繪畫，加上端木又是書法家和電影愛好者。他們的文字都具有強烈的視覺感。其二，在「品味」之外，他愛好比較，與同時代作家相比，與英美作家相比。他絕不在乎大陸官方倡導的那種「魯、郭、茅、巴、老、曹」《水滸傳》似的排座次。不過他也喜歡在個人品味之後給作家排高低。這樣一來，讀者就可以把個別的作家放在全國，以致世界文學的或歷史的範疇，並把分析的角度跨越學科領域，把文學和藝術，特別是電影繪畫及音樂來比較，從而分析這些作家。

總言之，夏志清先生對中國現代小說史論所做出的里程碑式的建樹，的確成為「不朽」（夏志清語），或不爭的事實。我們同時應該看重夏先生留下的另一份遺產，即他的審美原則和方法論。沒有這些原則，他也無法洞察他人所看不見的，從而完成他人所達不到的成就。

雷勤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

我今天要討論夏志清先生的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簡稱：夏《說》）。在英

¹⁶ 劉紹銘：〈筆說夏公〉，《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0年11月21日。

文版第三版的前言裏，王德威問道：「我們可以從這本書學到些什麼呢？」¹⁷ 讀者對任何一本書都可以問同樣的問題，但是對於教人敬畏的「名著」而言，這個問題最值得一問。我今天討論這部被奉為經典的研究著作，也要回到這個基本的問題：它的價值何在？

首先，夏《說》中的論說既大膽又帶著權威式的口吻，而且不依賴其他權威現成的說法。夏志清的評論宗旨，可以說既要老實不客氣地就書論書，也不吝給予作品應得的表揚。這種公平的、不留情面的評論精神，在夏《說》裏到處可見。比如，它針對茅盾的長篇小說三部曲《蝕》的討論是一個例子。另外一個例子是它對朱光潛的總評：朱光潛實際上只是個「第二流的美學家……雖然他對當代文學的評論相當敏銳」。就氣魄而言，夏《說》與無數的「初探」、「試論」等膽小的文章大不相同。夏先生彷彿事前已經知道自己的著作將會被視為一部里程碑式的參考書，因此他的目的往往更接近「評定」。

對讀者來說，這樣判斷作品的高下好壞之所以有用，不是因為它反映了批評家的傲氣，因而把讀者的注意力從文學作品拉到批評家的身上；而是因為定論下得不模糊，批評本身也可以成為批評的對象。夏《說》當中，除了評論之外還提供小說片段的翻譯，這種互補的形式讓讀者能夠「品嘗原作的滋味，以便測試我的判斷是否正確」。這樣的模式，賦予了讀者確保事實與參與論辯的兩種能力。夏先生一再地誇讚具有移情作用的小說，讚美它們能夠掌握他人的心理和情感，他提醒讀者「衡量一種文學，並不根據它的意圖，而是在於它的實際表現」。我認為夏先生自己的著作亦有其移情作用：他預料到讀者會希望作者以簡潔易懂的語言，提供相當的材料並加以詮釋；他並不否認異見的存在（比如，其他批評家對他偶爾自負的評論的批評），或者試圖把別人的意見淹沒，反而是對它們正面迎戰；書中所展現的明晰內容和好鬥精神都表示：這位評論家是有骨氣的。我認為這也就是夏先生與專橫的評論家一個很大的不同。

夏志清認為小說家應該有類似的骨氣，才能夠實現一個獨特的、個人的藝術觀。他認為茅盾在《子夜》中採取的漫畫式諷刺技巧之所以失敗，並非因為作者的

¹⁷ 本篇引文的原文和譯文根據：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rd ed.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99)；中譯：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序文和前言的引文為筆者所譯。

觀點是共產主義信徒式的，而是因為從作者對諷刺對象的態度裏「看不出一點由衷的憎恨」。這種個人化的批評法，可以說是就事論事、就人論人。他後來把《子夜》評為一部「失敗之作」，「乃是以茅盾過去的成就作標準來衡量它的緣故」。老舍的《牛天賜傳》的主要缺點，則是「作者對他的主題沒有著力處理」，與《駱駝祥子》相反。夏志清所表揚的作家，都有一種罕見的特色：他們「有足夠的天分與想像力，能夠無視於『時代精神』的要求，在寫作的道路上自闢蹊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張愛玲，「一位別有獨特風格和個人特色的奇才」¹⁸。

夏《說》中對人性的消極態度，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悲觀，給不少讀者深刻的印象，筆者也不例外。夏先生表揚能夠掌握「人本性的變態及其造孽作惡的傾向」的小說。他對張愛玲的荒涼美學讚譽有加。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多半「膚淺」，因為「其對『原罪』之說（就是：人類行惡的普遍本能）……不感興趣，無意認識」。就夏先生對單篇作品的批評而言，讀者可以體會到一種可以稱之為「導遊的移情」(tour-guide empathy) 作用，就是說它提出「該讀這本、不該讀那本」的實踐性建議。但是書中近乎謾罵的議論，似乎讓正在打造中的領域，在夏《說》中處於一種一邊搭臺、一邊拆臺的矛盾狀態。能夠把關於「中國文學」這個抽象領域的民族主義焦慮放在一邊，好好地鑒賞單獨的文學著作的讀者，是最幸福的。

富於權威性的夏《說》，跟任何形塑新研究領域的大作一樣，讓後起的批評家們必得付出更多心思，才能得到相當的回饋。當傑作都已被點評之後，新一代的批評家的下一步是什麼呢？面對這個挑戰，我們彷彿只能補充或對典律加以改寫。夏先生在後來的論文中也自己做了補充（有的論文後來被收入新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附錄）。夏先生一九五〇年代在美國寫道，抗戰年間國民政府的文壇情況「極難評價」，因為戰時出版物和書刊不容易取得。相較而言，現在就容易多了。我們都可以想出有資格上榜的小說家。當然，在改寫補充之外，我們也不妨從其他的脈絡切入，運用其他的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的價值。

在夏《說》中，夏先生建構新的文學典律的同時，也在推倒原本典律中的偶像。比如，第一章裏就批評了陳獨秀對胡適一九一七年的〈文學改良芻議〉的回應：「以文學知識和立論態度來講，真可謂集無知與不負責任之大成。」夏先生不

¹⁸ 1985 年的中文版缺少原版裏的這句話：“But the whole work [*The Golden Cangue*] is undeniably the creation of a highly distinctive and individual talent” (Hsia, p. 398)。

僅改寫了民國時期文人所編纂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試圖形塑的文學典律，以及共產黨後來「奉為金科玉律」的文學家名單而已，他也點出了天主教傳教士在一九四〇年代編寫的導讀書目《當代中國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¹⁹的重大缺點，正確地指出：「由於狹窄的道德觀念和語言能力之不足……〔它〕表現得極其輕率幼稚。」

夏先生那支生龍活虎之筆，特別吸引人。當我們發現自己的文章囉嗦乏味的時候，不妨把它拿來翻閱一遍。他讚賞葉紹鈞懂得適可而止，描寫中沒有穿插多餘的解說。夏氏自己的文章一樣簡潔。他文字精煉、警句百出。即便偶爾順便提出來的觀察也是如此。

還有兩點值得強調：其一，是有關夏《說》當中對和現代文學相關歷史的觀察。這些觀察跟文學作品價值並沒有直接關係。比如，他指出文學革命的倡導人胡適，「所提出的有關文學的理論，並不是為了替自己的創作辯護而寫的」，而胡適自己後來也沒有投身創作。書中關於現代歷史很多這類的精彩觀察，還有待學者進一步探討。另外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夏《說》評論的作家多半是當時在世，論及的事件有的當時也正在展開當中，比如反胡風運動、百花齊放，以及反右運動。換句話說，文學史學家不必把當代的文壇動態，拱手讓給新聞記者書寫。

十六年前，王德威認為：「也許我們再也不需要運用『偉大傳統』的評論方法來討論中國現代文學，說不定也已經不會寫這類的書了。」不過，能夠清楚且尖銳地分出良莠的評論，總是會受歡迎。國外如此，我相信，國內也如此吧！

夏志清是一位敢預言的評論家。半個多世紀以來發生的事情，有的已經肯定了他的遠見，有的則是提醒我們：未蓋棺，勿定論。不消說，夏《說》的一個主要貢獻，是它大大地擴展了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討論空間，引發了百家爭鳴。在夏《說》的結論當中，夏志清指出，文學作品被視為是「博物館中的收藏品」還是「活傳統」的一部分，要看當下主流的政治環境。我認為正是這樣的洞見，讓我們體會到為什麼這部學術專著，可以超越作者所處的政治環境的限制，為什麼現代文學批評的活傳統當中，我們還是少不了夏《說》。

高嘉謙（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我第一次讀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九〇年代初期在臺大大一的

¹⁹ Joseph Schyns, *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1948).

「現代小說選」課程。那堂課的老師是目前已退休的郭玉雯教授，她指定的讀本就是夏先生的《小說史》，兼及王德威教授的《從劉鶯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非常喜歡沈從文的〈靜〉、對錢鍾書《圍城》、〈紀念〉的諷刺文體印象深刻，對現代小說感時憂國傳統的初步認識，基本上都是那堂課的收穫，當然也是來自於夏先生小說史觀點。郭老師講課非常精彩，她的課堂多聚焦小說細讀，對學生提問兼引導思考，往往最能啟發我們的文學感受，並隱約提示讀小說的方法。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卻是大框架的補充和參照，課堂談最多的是具體的文本，但這些小說家的寫作譜系，以及風格的判斷，基本上都可在書裏找到補充的意見。當時上郭老師的課覺得頗有趣味和收穫，也許除了郭老師一流的口才外，可能是我們同時兼讀《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先生寫作方式不僅是在勾勒小說的發展史，同時對文本大量節引、細讀和風格判定，不完全是做小說史的梳理，卻同時展示批評家的識見和想像力。我不確定在郭老師之前教過現代小說選的柯慶明先生、何奇澎先生是否也用《中國現代小說史》當教材，但郭老師在臺大教了好些年的「現代小說選」，夏先生的《小說史》應該影響和形塑了中文系學生對現代小說的知識。

從今天的眼光回看，夏先生《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史觀，已是我們對現代文學史的基本認識。但回想夏先生寫作的六〇年代，他提倡張愛玲、錢鍾書，固然可看作是他自己的閱讀眼光和判斷，但他談文學革命也完全不拘泥主流的「新／舊」史觀。他對現代文學發展的解讀，依然著眼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趣味。我們看他對章回體小說，以及鴛鴦蝴蝶派的判斷，他說那是一脈相承的歷代白話小說傳統，卻認知到「純以小說技巧來講，……有幾個人實在比有些思想前進的作者高明得多了」。他尤其強調小說背後寶貴的社會性資料，他的解讀方向卻是：「民國時期的中國讀者，喜歡的究竟是哪幾種白日夢？」顯然他對現代小說的理解更為開闊，他的小說史觀還是比較從容的。

另外，談文學革命，他刻意提到了新詩起步的艱難，背後就是白話新詩與傳統舊詩之間糾葛的音韻問題。「舊詩的成就太輝煌了，太多姿多采了，新詩人無論選擇那一個方向，都一定會感到吃力不討好的，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事」。夏先生的判斷直指核心，卻率真地點出他在新舊之間沒有受限於正統新文學史觀的牽制。

他寫作現代文學史卻同時對舊詩傳統保留客觀的認知，他眼下的文學革命，顯然並不張揚新革舊的命，而是回歸文學本身討論內在的文學性。因此，他做出的

判斷：「這是由於作者個人感受力不夠，因此無法使他們運用的文字起昇華作用，變得寓意豐富，緊湊有力。看來，新詩要找到一種成熟的體裁，還要走一大段路呢。」如此看來，夏先生的《小說史》在評點文本的基礎上來敘夾議，全書可讀性甚高，還有賴於他突出的小說知識，以及處處回歸文學本身的趣味。

四、當代小說家論夏志清

朱天文（作家）：

為了參加這次紀念研討會，我把夏老師的信找出來看，現存連卡片有十二封，之前也許還有二、三封吧，總之不會超過十五封，重看信，只覺得真是交淺言深。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有一段講到我父親朱西甯：

我比較喜歡「寧」字，覺得比「甯」秀氣而美，但你爸爸從來未寫過「西寧」兩字，總是「西甯」。六十六年平鑫濤請我吃年飯，因和張愛玲簽合約有關係，他請你爸爸作陪。那時我不知道他是張迷，你爸爸也不提醒我一聲，所以吃一頓午飯而並未增加友情。數年之後，也在飯局上，我對西甯說，他、我、水晶三人對張愛法不同，大概你爸爸算是「敬愛」，他聽了臉有笑容，似乎很高興。

很可惜，夏老師沒有說他和水晶的愛法，我寫信時也不至於去追問，如今也許只能求問於夏師母了。

夏老師竟然會注意到我父親從未寫過一隻腳的「寧」，總是兩隻腳的「甯」，這種記憶力，和對事物細節的綜合力，應該是小說家的特異功能做的事，真令我驚異。事實上這在我父親，確實是經過選擇而有意為之的。父親喜歡兩隻腳的「甯」因為比較穩，像馬步紮實，像古典建築對稱和協，像詩四字依據的節奏（據稱是漢民族的脈搏律動）。但夏老師喜歡單隻腳的「寧」，取奇數而破偶，正像夏老師一生的行事風格，用他信上的話是說：「四十多年前，我未看任何參考資料，自己肯定愛玲為最優秀的作家，膽子也實在真大。」（2001年2月24日）

父親在世的時候，我是稱夏伯伯、夏伯母的，父親離世後，好像我們自有我們的交情，就稱夏老師、夏師母。還是夏老師的信說得有趣：「天文賢姪，您老稱我伯伯，我也叫您一聲賢姪，下不為例，因為論性情文章我們都是平輩，當且我同你的父母也是平輩。」（1999年6月15日）

夏老師曾經付了一張一百五十元美金支票，囑我兌現做為郵費之用，把他手上缺的天心的書、我的書寄給他，「如有餘錢，令尊早期的小說集也可寄我幾冊」，他寫說：「然後我想細讀你們二姐妹的作品，為你們個人寫一篇評論，我真的要為你們朱家（也為文壇）做些事。」這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夏老師快八十歲了。同一個時候，他要先把大陸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新序寫出，再校閱聯合文學給他排印的《中國古典小說》校樣，並為此書寫篇序，接著得把哥大出版社為他集印的英文論文集仔細校閱一遍。哇，夏老師太厲害了！

駱以軍（作家）：

有一次，在一個吃飯的場合，胡金倫問我：「你有見過夏志清先生本人嗎？」我說：「有哇。」他非常困惑，因我去美國有限的兩次，他都知道，但那都並沒有見到夏先生的可能；也不可能夏先生微服出巡溜回臺灣，見我這小胖子。後來飯局散了，我大夢驚醒，我根本沒見過夏先生，但為何會吹牛說我見過呢？後來我想起，為何我會有種「我見過夏志清先生本人」的記憶誤植？那是有一個美國人「小白」(Michael Berry)先生，有一次來臺北，喝酒時，像調皮的年輕人學夏先生講話，學夏先生急速說話，罵人連珠炮的上海腔，於是給我腦中產生記憶的錯置。

「沒有見過夏先生，卻以為自己見過」，這恰好可作為夏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我的某種啟蒙意義。我大約是剛考上大學那個暑假，一個人住在深坑，那小屋子我父親放了許多永和家裏放不下的書，我父親是一個那年代跟著國民黨跑來臺灣，很平庸的大學中文老師，他的書大多是中文系古典的那些經、史、子、集。但我記得他書桌有一本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我在那之前對現代小說，完全是個無知的狀態，高中十八九歲時混流氓，什麼都不懂。但把這本書當故事書讀了，那對我產生了一個像地殼板塊形成火山的大地貌似的影響。那時以後，好像覺得自己跟這書裏提到的那些作家都很熟；張愛玲當然是，當時還讀到朱西甯先生、水晶、唐文標這些第一批張迷的書、文章。也真的迷進去，很長一段時間讀她的小說。沈從文也讀了一些，這都受到夏先生說這些作家身世的影響。但魯迅，我是大二在文大，上張大春散文課，他開的是魯迅，當然也是後來幾年才補著讀完他的小說。老舍是我念研究所時，陳芳英老師開了一年的「老舍專題」，才算整個讀過一遍。錢鍾書、蕭紅、茅盾、丁玲的幾篇，當然那時也慕名讀過一些。但大部分，像師陀、張天翼等，書裏大部分的名字及他們的作品，我讀都沒讀過，卻以為自己跟

他們很熟。想來這種幻覺就是來自於當時將夏先生的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當成故事書來讀。

張愛玲、沈從文、魯迅、老舍，他們各自用自己的「後來的時間裏的扭曲、變形」，或許微弱的尊嚴去演出、或證驗這個劇烈變化，從死胎中硬生生分娩出的所謂新中國。那個話語的巨大效力，包括各方記得的，仍在「拿來主義」，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中，引進的歐陸、英美，或日本、舊俄或蘇聯的各種新的小說種類、新的哲學思潮、新的人類存在的探勘方式。他們身上又各自存在著不同時間刻度的那個「舊中國」，這個回看，他們似乎一點將這個「個人」藏匿起來的空間都沒有。從五四到國共鬥爭，到對日抗戰，作為創作者的個體，幾乎全被捲進、吸進那個大亂鬥的巨大絞肉機裏。新和舊，中和西，革命或反革命，自由派或左翼……，這使我覺得在無知中非常幸運，在某一個時間點，像我這樣一個遲到又遲到的小胖子，在那個解嚴前後，對所有曾發生過的事都全然無知的那個年紀的我，在深坑鄉下父親的書桌上，翻閱的夏志清先生的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

可能在那之前的一個模糊年代，臺灣，像魯迅、老舍、茅盾、巴金、丁玲、蕭紅，甚至沈從文，這些名字全是被封印在禁書的「不見，不存在」裏。夏先生這本書在臺灣出版，也是「遲到的」。當然對我這代而言，沒幾年，就懵懵懂懂地接續上王德威先生的九〇年代，朱天文、朱天心、張大春、張貴興、李永平、李渝他們的九〇年代；同時從洪範、隱地，到陳雨航先生的麥田出版社，像一個物種爆炸時期的阿城、莫言、李銳、王安憶、韓少功、余華、薛童、賈平凹的年代，這樣回頭看那個（借用董啟章的詞）「天工開物」、「物種起源」（安卓珍尼）、「時間簡史」或「學習年代」，覺得幸運是夏先生個人開朗的特質、調皮、美式的自由紳士風，亦是某種天真，或一種「南方文人」的對文明教養的相信，對文學裏個人獨特性，或人心存在處境的幽微、衝突，因而拒絕成為過簡之「革命式意識型態傀儡」的頑強姿態。否則在原本那個宇宙的重力法則下的那個地表上，很難想像可以持續的，合法的在中文現代小說的地表演化，長出像朱天文、朱天心、舞鶴，或李永平、董啟章、黃錦樹或童偉格，或我自己，這樣的小說。

郭強生（作家／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暨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教授）：

夏老師好客愛熱鬧，因為他的名氣，四方前來拜會求見的中、港、臺藝文人士，也總是不斷，原本我也只是這些絡繹不絕的訪客之一。一九八九年受前老板

《中副》主編梅新之託，順我在紐約求學之便，去訪問夏公。那次訪問後，我發表了〈現代的心緒，古典的情懷〉一文，之後再沒有機會見面。直到一九九八年王德威老師找我去哥大開了兩門課，與夏公見面的次數突然開始變得很頻繁。

有那麼幾年裏，我常陪夏老師與王洞師母看舞臺劇，上館子，聊畫展與電影，出入老師家感覺很自然，一點也沒有去拜訪長輩的壓力。隻身海外十載，看到老師、師母總有一種如同家人的親切。等到決定回國任教，我才發現雖在紐約那麼多年，臨去前捨不得的人事物並沒有那麼多，夏老師與師母卻是其中之一。

最後一次跟夏老師說話，是在二〇一二年底的幾次越洋電話，為了幫忙《聯合文學》那本《張愛玲與我的信件》作專輯。我有好幾年沒去紐約了，一來是不耐長途飛行，二來因為那段人生在我心裏是再也不會回來的黃金十年，之後雖有幾次故地重遊，都已經不是同樣滋味了，除了一定會去看望夏老師外，以前的朋友都已不想聯絡。二〇〇六年我出版散文集《就是捨不得》，特別請夏老師為我寫序，老師健康已不如前，但仍允諾，雖只是短短六千字，我一直視作珍貴的紀念。

夏老師是我紐約回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幾年裏，碰到的臺灣或中國朋友多半在談華人圈的瑣事，談哪個研討會上遇到了哪些人，談華人在美國要出頭該如何如何，那種彼此取暖又互相較勁的矛盾心情讓我感覺沮喪。但是夏老師不同。他是少數讓我對文學不曾幻滅的前輩。他博學自信，有人認為他口無遮攔，我卻喜歡他的直率不造作。如果在我心裏還存有一個文學大師的形象，那應該就像他。喜歡美食美女，喜歡有教養有文化的人事物，喜歡一切的知識，不掩飾自己對粗俗的厭憎不耐，對生命充滿樂觀與謙卑。

記得一九八九年那次去訪問他，他那時還沒退休，我們約在他在哥大的研究室。一進門我就看見我的小說集被他放在案頭，他不僅特別找出來，還真的翻閱過，並說了一些鼓勵的話。所以我知道夏老師的訪客雖多，他並不是一味跟人應酬而已。另外，認識夏老師的人都知道他喜歡電影，老片如數家珍，新片也不放過。那時他身體仍健朗，還會上電影院。我也許是少數對於他天南地北的電影知識，尤其是電影明星，話匣一開還能跟得上話題的人。和我這個晚輩談天說地，如果讓夏老師覺得有任何有趣之處，恐怕是因為我念的是戲劇，然後還寫小說，對美國文化涉獵較雜的緣故。記得有回宴請林文月教授，一道黃魚上桌，裹了粉炸得尾翹頭昂，姿態挺妙，夏公一見那魚不改老頑童本性，用英文興奮喊著：看啊，伊漱·威廉絲來了！結果席間只有我一個人噗嗤笑了出來。伊漱·威廉絲 (Esther Williams)

不算什麼重要的好萊塢巨星，專拍一些米高梅七彩歌舞片。因為是游泳冠軍出身，她主演的電影也都是像《出水芙蓉》這類充滿水中特技的電影。看到了黃魚扭曲誇張的身體，想到了伊漱·威廉絲的俗麗賣弄，這是夏公的典型跳躍式思考，卻非常傳神。

夏老師很懷念位於紐約中央車站二樓的餐廳 Oyster Bar，有回跟我說他好多年沒去過了，要我陪他去回味一下。當年此地是很多紐約文藝界人士出沒的地方，代表了一九五〇年代紐約躍身國際大都會的一種品味，繁華現代卻也匆忙快速。但是那回我們看到的只是一間普通的店了。夏老師有點失望，但是難得地聊起了很多他三十幾歲初來美國的記憶。四十歲不到，就完成了英文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那當然是好好下過一番苦工的，但是從夏老師口中，我聽到的是一位年來自舊中國的青年，看到蒸蒸日上的美國，心想如何能與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當年指標性的進步社會並駕齊驅的樂觀之心，他非常以會在那樣百花齊放的年代，留下了自己的印記為榮。

《中國現代小說史》不光是寫給中國人，那是寫給全世界的。中國的「現代文學」應該是什麼模樣，他比所有中國作家與評論家的想像都早了一步。他最有名的那篇論文，談“Obsession with China”，後來中譯都翻成了「感時憂國的文學」，與原意的批判立場略有出入。那是夏老師對中國文學不能獨立於政治與社會運動之外的愛深責切。文學不是宣傳品，應該處理反映更普世的人性，這樣的文學在閱讀之後，才可達到人性素質的提昇，這便是他何以尊沈從文、張愛玲而輕魯迅的原因。夏老師在那個年代，便已跳出了中國文人盡在為路線之爭而筆戰的本位主義，他將這種心態謂之 Obsession（著魔）一點也不為過。這種文學迷思又何曾完全被祛魅？“Obsession with China”恐怕也是臺灣文學得面對的課題。可惜夏老師對臺灣文學的注意到了八〇年代後便中斷了，如果他的體力允許，肯定仍會一針見血，一語驚醒許多不通之人吧！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號的《紐約時報》，以相當醒目的位置，於藝文版刊出了夏老師過世的消息，肯定了他將中國文學帶進西方的重要成就。在天上的夏老師應會感到欣慰。夏志清這個名字，的確已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資產，他如此深遠地影響了中西幾個世代以來對中國文學的看法。但我相信這一切並不會因他的謝幕而劃下句點。